

教育革命通讯

1

1975

出版

印刷

5元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教育革命通讯

一九七五年 第一期

目 录

思想评论

短 评 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奋斗 …… (3)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教育革命 ……肖 戈 (5)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论拿破仑 ……北京大学历史系 石 建 (8)

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晚唐的儒法斗争 ……吉林师范大学 童 新 (18)

简论刘禹锡和他的政治诗 ……北京师范学院五七干校理论组 (23)

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

以革命精神学革命经验.....北京大学 柏文 (29)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而奋斗

.....辽宁朝阳农学院党委书记 徐明 (31)

朝阳农学院新闻剪辑.....本刊记者 (38)

简
讯

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辽宁省委联合召开

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议..... (41)

加强党的领导 迎接新的跃进

书记动手 全党抓教育革命.....中共河北省邢台地委 (42)

遵化县1976年——1985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草案)..... (45)

为革命大造“争气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 (50)

工科院校要大力支援农业.....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53)

世界经济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通俗讲座.....北京大学 哲军 (55)

(一)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55)

(二)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59)

资料

研究李贽问题的新史料

——《清源林李宗谱》(部分)简介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63)

★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付印 ★

传
级
教

千
志
在
阶
复
“

替
中
治
阶
开

路
占
展

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 专政的工具而奋斗



学校是什么？这是教育工作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是教育战线所有的同志都能做出正确回答的。“学校就是读书的地方呗！”有的人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有的人嘴上不这么讲，心里却老是这么想。这是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在作怪。这样的同志无论他工作如何努力，可以肯定，他不但在无产阶级教育学这个考卷上要得零分，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不能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

那么，学校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学校历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千百年来剥削阶级总是说，学校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是骗人的鬼话！列宁同志指出：“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翻开历史，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办私学，为的是复辟奴隶制度；地主阶级办教育，为的是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资产阶级办学校是“用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恭顺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来专门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走卒和奴隶”，以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把教育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通过它宣传本阶级的政治路线，灌输本阶级的思想，按照本阶级的需要来培养人的，只是由于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为少数人谋私利，因此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而我们无产阶级则公开声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由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决定的。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本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彻底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必须“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

人。有社会主义觉悟，就是懂得党的基本路线，胸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时时处处自觉地同资产阶级、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管是做工、种田还是干别的哪一行，首先都是干革命，干阶级斗争，并把自己所从事的那一部分具体工作同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有的人，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不承认学校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只讲有文化，不讲有社会主义觉悟和要做劳动者，这样的话，不就恰恰中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奸计了吗？不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维护者了吗？问题很清楚：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文化知识，而在要不要把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分水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一切阶级办教育，都是通过贯彻一条路线来实现本阶级的意志的。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集中起来，就是按照哪个阶级的教育路线来办学的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往往不公开宣扬要使学校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而打出“智育第一”等骗人的幌子，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来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什么“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在教育战线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搞“智育第一”，旧的教育制度、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就可以丝毫不动地保存下来；搞“智育第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子女就可以重新垄断学校；搞“智育第一”，劳动人民的子女入了学也会变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搞“智育第一”，就会使学校的党组织蜕化为修正主义的“业务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沉痛教训，难道我们能够忘记吗？回顾解放以来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每一次猖狂进攻和反扑，大都是在所谓“教学质量”问题上发难的。我们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提高革命的警觉性。当前，要抓住批林批孔的有利时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打扫各个角落里的孔孟之道，努力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伟大教育革命思想，夺取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这是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保证。斗争实践表明，哪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哪里教育革命就向前发展；哪里抵制和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哪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和表现就严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学校阵地问题上的任何动摇，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让权。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下转第7页）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教育革命

肖 戈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当前，在全国新的跃进局面就要到来的大好形势下，自觉运用这个规律去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对于坚持继续革命，夺取新的胜利，十分重要。

列宁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斗争得来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伟大成果。同样，发展这个大好形势，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作战。那种以为批林批孔搞得差不多了，可以安安稳稳办教育，一心埋头钻业务的想法，是违背阶级斗争现实和对立统一规律的。孔孟之道流毒两千多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年深日久，经过几场战斗就可以扫除干净吗？列宁早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长长一系列的战斗”。应当清醒地看到，每当革命斗争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资产阶级总要从防空洞里刮出一股“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阴风，妄图使我们解甲休战，以便保住他们仍然盘踞着的阵地，准备卷土重来。我们要学习鲁迅“永不休战”的革命精神，“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一切决心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应该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只有永远记住‘最终目的’，只有从总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评价每一个‘前进’步骤和每一项各别的改革，才能够保证在前进的路上不致失足”。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改造教育阵地，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

毛主席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时指出：“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所进行的教育革命，说到底，就是要使教育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教育都是为它们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现在旧的经济基础

用的学识不或认然教合不贫匠加革
~
(加专一的和阶和实:

已经改变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和三大革命的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使教育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还是“基本照旧”，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资产阶级从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出发，总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极力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了学校，教育不但没有起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反而起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经过文化大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对旧的教育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使教育逐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看来，适应是相对的，有相适应的一面，还有相矛盾的一面；改变了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又会产生新的不适应。特别是由于“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而我们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学习得不够，理解得不深，实践的时间还较短，因而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地方。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革命者，就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应当改什么和究竟怎样改，就看不清教育革命的方向。

我们的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进行教育革命一定要考虑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贡献力量。在这个问题上，朝阳农学院和其它一些学校已经走在前面了，各级各类学校都应该积极赶上。要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使这一切加强起来，以后更百倍地加强起来”。不这样，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是教育战线上的所有同志都认识到这一点了呢？还没有。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院校中，有的人虽然嘴上也承认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但就是不肯往农村迈一步，或者千方百计“越办越向上”，最终目的就是要搬回城里来，“他们总是用原则上同意而实际上不同意的手段来葬送一切”。我们希望那里的革命干部、革命教师、革命学生、革命家属头上“长角”，混身“长刺”，敢于跟那里的“鬼”现象斗。“见鬼”的旧农大办了十七年，我们决不能让它重演；相反，我们要同它彻底决裂，一刀两断！

敢不敢对旧教育动大手术，能不能以势如破竹的气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的情况下，关键在于领导。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发表之后，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人们在教育革命中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同时，这一革命的潮头也冲破了一些同志头脑中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的思想，给那些习惯按常规走路的人击了一猛掌。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是一对矛盾。

是发
国，
农村
在前
和系
社会
一点
为农
上终
目葬
送“长
了十七
改革，
发表之
大的步
日的思
矛盾。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为了使主观认识不断跟上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必须大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有种种表现，其中一个为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同志常犯的认识论上的毛病，就是往往把眼光局限于教育这个狭小的圈子里，就教育论教育，不注意研究整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形势，尤其不注意了解工农业生产实际，或者把这些同教育革命割裂开来，坐井观天，固步自封。这种状况使我们同志的认识，脱离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际，是一种书呆子气，必须彻底打破。否则，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中去，走进资产阶级骗人的所谓“为教育而教育”的死胡同。历史上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发展的革命形势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投身到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不仅要关心教育革命，还要关心工农业生产；不仅要熟悉学生，还要熟悉工人、贫下中农；不仅要办好学校，还要走向社会。总之，只有使我们的思想从旧教书匠式的狭隘框框中解放出来，才能高瞻远瞩，朝气蓬勃，带领群众开创出一个更加热气腾腾的教育革命新局面来。

一九七五年到来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在教育革命上大干一场。让教育革命的航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上接第4页) 在农村则切实依靠广大贫下中农管好学校，发动广大工农兵参加教育革命，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把学校改造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能够造就一批又一批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坚强战士，能够加强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有效专政。为实现这个目的，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的党组织就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

我们坚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我们前进，教育要革命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把学校改造成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任务，一定能够完成！

济 作 结 多 二 其 涉 决 群 业 所 各 的 制 伦 自 的 斗 望 反 结 个 演 产 国 土 上 捕 贵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论 拿 破 仑

北京大学历史系 石 建

拿破仑这个人，曾经把欧洲的封建贵族搞得坐立不安。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们于是联合起来，宣布拿破仑是“人类之敌”，对他进行围剿。从这一历史事件中，现代修正主义者居然发现了俄国沙皇和欧洲人的“战斗友谊”，他们一方面咒骂拿破仑，一方面叫嚷是“俄国军队把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从拿破仑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①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马克思主义认为，“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恩格斯：《德国状况》）拿破仑的统治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革命过程中，拿破仑代表了当时的先进力量，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

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冲破了封建欧洲的一片黑暗，迎来了新的黎明。革命时期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不仅改造了法国社会，而且深深震动了欧洲。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所作的事情是这样之多，“以至整个十九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人民群众以大无畏的精神，冲击王宫，踏平监狱，逮捕国王，最后把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教会被打得威风扫地，贵族和僧侣纷纷逃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代替了地主贵族的特权和专制。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在这股汹涌的急

流中，年青的拿破仑顺势而进，成了法国革命中的英雄人物。

拿破仑出生于法国的科西嘉岛，少年时进军事学校，读过孟德斯鸠和卢骚的作品，深受“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一七八五年，当他结束军校生活走向社会的时候，法国正处在革命风暴的孕育时期。拿破仑读了很多书，怀着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迎接了这次革命，在一七九一到一七九二年间，他两次回到故乡科西嘉岛，同当地的保皇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法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使得整个欧洲的封建君主们都不寒而栗。俄国沙皇尤其憎恨法国革命，他积极策划“反法同盟”，直接出兵镇压革命。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复辟活动相勾结，使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多次面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复辟，才能把革命推向前进。每当革命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人民群众就奋起斗争，以无坚不摧的力量打退了封建势力的猖狂反扑，挽救了革命事业，同时也加强了资产阶级左翼的力量，使保守派的政权依次被更加激进的派别所掌握，一七九三年，建立了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专政——雅各宾派的专政。

雅各宾专政时期，拿破仑是一个二十四岁的炮兵上尉。当时，“反法同盟”的干涉军已深入国土，兵临城下；国内的保皇党以土伦为据点，在法国南部各地制造暴动，法国革命面临着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一七九三年冬，革命军围攻土伦，拿破仑向指挥官提出了用炮兵突破、步兵迂回的作战方案，并在关键时刻亲自冲锋陷阵，在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消灭土伦的反革命，对保皇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南方各地的骚动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土伦事件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修正主义者为了贬低拿破仑，往往把这一事件说成是拿破仑实现“个人欲望”的一次偶然机会，他们否定了法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否定了革命时期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从而陷入了历史的唯心主义。唯物史观总是把个别人物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拿破仑在反复辟斗争中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活动符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因而在革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轰轰烈烈的场面。

雅各宾专政实行了许多有利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措施，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向了它的顶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革命政府用恐怖手段镇压了国内反革命复辟，同时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把外国干涉军全部赶出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又趋激烈，一七九四年七月，大资产阶级上台，成立了两院和五人组成的督政府，拿破仑由于和雅各宾派的密切关系而被捕。大资产阶级的右倾，引起了复辟势力的死灰复燃。在德国的科布伦茨，逃亡贵族组成了复辟政府；与此同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结成了新的“反法同盟”，

在彼得堡发出了一片叫嚣，扬言要“惩办”革命分子。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进一步激化。这一时期，拿破仑同国内反革命复辟势力进行了两次有重大意义的斗争。第一次是一七九五年十月，保皇党人在巴黎组织武装暴动，企图一举推翻督政府，重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拿破仑被捕以后，不久即获释，此后和督政府的关系一直不好，但是在一七九五年十月国内形势十分紧迫的情况下，他欣然接受了政府的任命，负责镇压保皇党暴动。当时，反革命分子纠集了两千四百多人，拿破仑指挥的军队只有五百多人，他没有因此畏缩不前，而是同保皇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都告完结之后，我才会放刀入鞘”。在拿破仑指挥的炮火轰击之下，保皇党的复辟阴谋破产了。第二次是一七九七年，大批保皇分子利用选举钻进了立法会议，控制了两院的多数，准备完全恢复封建君主制，督政府的右倾又一次给革命带来了危机。当时，拿破仑已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正在国外作战，他从意大利派回了军队，清洗立法会议，处死了一百六十名保皇党，许多反动分子或者被赶走，或者被流放，又一次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政权。

历史证明，腐朽没落的、已经被推翻的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以十倍的疯狂进行反革命复辟，或从外部进攻，或从内部颠覆，力图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拿破仑依靠革命的军队，克服了督政府的左右摇摆，在紧急关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反革命，这不仅是他个人对法国革命的贡献，而且是一七九四年以后法国阶级斗争所表现的特点。它说明，新兴的资产阶级只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进行斗争，才能保卫革命和巩固胜利。雅各宾专政曾经做到了这一点，但由于它的许多措施已经超出了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在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就被大资产阶级所推翻。大资产阶级的督政府既害怕人民，对反革命复辟势力又表现得软弱无力，因而使国内形势不断恶化。法国革命面临着一个新的局面，它要求产生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才能克服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那被战争弄得疲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性。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充当的。”（恩格斯：《致亨·施塔耳肯堡》）一七九九年十月，拿破仑从北非回到巴黎，十一月九日（“雾月十八日”）彻底改组督政府，后自任第一执政，独揽大权，强力肃清国内骚乱，开始了法国革命的新阶段。

拿破仑政权的产生，既不是“天才活动”的结果，也不是“个人欲望”的实现，它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发展，是共和国的需要，是革命时期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产物。

一
俄
内
国
段
中
努
赞
恩
并
资
说
后
他
加
治
室
旁
自
要
拿
作
中
此
要
了。

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作用

“雾月十八日”以后，实际上开始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一七九九到一八〇〇年，教会在各地进行反革命煽动，保皇党在诺曼第组织了大规模的叛乱，俄军逼近法国，新的“反法同盟”的威胁，加上督政府时期造成的财政危机和国内混乱，这就是拿破仑所面临的局势。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宣布法兰西为帝国。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阶段。法国资产阶级不仅要和国内外的复辟势力进行严酷的斗争，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来巩固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使命。现代修正主义者以种种努力去维持和歌颂旧事物，他们对于俄国封建皇帝镇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行径赞不绝口，而对于拿破仑这个坚决打击封建复辟势力的资产阶级皇帝则骂不绝口。恩格斯曾经分析了拿破仑的许多错误，但是他指出：“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恩格斯：《德国状况》）因为，拿破仑称帝，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拿破仑自己也并不注重于王位本身，而是关心对本阶级的事业有所作为。他说：“皇帝这个称号有什么了不起呢？它同其他字一样，只是一个字。如果我与后世相见时，除了这一称号之外，别无所有，那我就将为后世所耻笑。”因此，他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全部权力来巩固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成果。一方面加强对复辟势力的镇压，一方面也镇压雅各宾派的反对，加强对工人、农民的统治。但是，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来说，更突出的是进行反复辟的斗争。波旁王室、教会僧侣和贵族阶级曾经寄希望于拿破仑称帝，以为建立帝制，就意味着波旁王朝的复辟。路易十六的兄弟、逃亡国外的普罗旺斯伯爵给拿破仑写了一封信，自称“路易十八”，要求拿破仑让他回国，恢复波旁王朝。他恬不知耻地说：只要这样，拿破仑就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任何“奖赏”，可以使“后代得到幸福”。拿破仑的答复十分干脆：“你不要指望回国，如果你要回来，必须用十万个尸体作代价。”路易十八的皇帝梦破灭了，复辟势力以更加隐蔽的手段开展活动。

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拿破仑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首先是强化中央集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把很大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权力得到了更高度的集中和强化，因此有人称拿破仑是“骑在马上上的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十分懂得巩固政权的重要，他说：“在所有时代，国家的第一条法律就是国家的安全”。军队被加强了。拿破仑把战争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手段”，准备随时对付“反法

同盟”的进攻。根据一八〇〇年二月十七日法令，地方自治改为行省制，全国划分为八十八省，省长由中央任命。拿破仑时期，警察制度更加严密、系统。保皇党人曾经多次组织暗杀和破坏，拿破仑就是得力于他的警察和官僚机构，给反革命复辟活动以沉重打击。当然，拿破仑的警察和官僚机构从一开始也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

其次是加强法制。一七九九年的宪法确认了拿破仑个人的一切权力，同时保护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宣布了原则上的“自由、平等”。一八〇三年以后，又陆续颁布了“民法”、“刑法”和“商法”等法典。“民法”共二二八一条，称为“拿破仑法典”，一切规定都以不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原则；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为外国军队服务或参加外国军队团体者，丧失法国人资格。这主要是针对那些逃亡国外的保皇党分子而发的。拿破仑时期颁布的各种法典是资产阶级立法的典型，它的思想基础就是确立资本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在立法上都得到了保障。拿破仑法典特别肯定了农民剥夺贵族和教会土地的所有权，从而使得“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这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拿破仑法典同时又是镇压工人运动的工具。拿破仑的“刑法”规定：禁止工人参加工会和参加罢工斗争，没有“身份证”的工人被视为“流浪者”，要依法治“罪”。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拿破仑十分重视立法活动，他曾经和当时的一些法学家们逐条讨论过一些法规，他后来回忆说：“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十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是“启蒙运动”的民主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实际成果相结合的体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欧洲资产阶级社会，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法律表现。把拿破仑法典和同时期的沙皇俄国的农奴法比较一下，就会很清楚地知道，十八到十九世纪的欧洲，究竟在什么角落里盘踞着最腐朽、最黑暗的真正值得诅咒的反动势力。

此外，对于教会，拿破仑采取了有时打击有时利用的政策。教会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中世纪欧洲一切黑暗势力的代表。法国革命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废除了什一税，封闭修道院，裁减教区，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权威。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就是打着“拯救宗教”的旗帜来干涉法国革命的。拿破仑不信上帝，他对僧侣贵族的复辟活动的打击毫不留情，他认为，宗教不过是一种“安慰”，“它想永远用镣铐来束缚”那些“不幸的人们”；但是，拿破仑看到了宗教对法国农民的传统影响，他要利用这个“精神警察”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象中国历史上

的一些坚持法家政治路线的皇帝也搞点“尊儒”活动一样，不相信上帝的拿破仑也重视起宗教来了。拿破仑维护了法国革命时期对教会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对教会做了让步。一八〇一年，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订的协议，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恢复礼拜活动。在拿破仑看来，宗教是一种工具，罗马教皇也是工具。一八〇四年，拿破仑利用教皇给他举行加冕礼；五年之后，又一纸命令，剥夺了教皇的全部财产，并把教皇抓起来押送法国监禁。这个被封建君主们顶礼膜拜的精神主宰，在拿破仑面前变成了一个胆战心惊的小丑。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极力加强和巩固它的经济基础。拿破仑帝国进一步扫荡了封建时代的污泥浊水，清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拿破仑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政府协助兴建企业，鼓励使用新的技术。拿破仑发展经济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为加强国防、抗击“反法同盟”准备了物质条件。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经过拿破仑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大大地削弱了国内的反革命复辟势力。可是，由于当时国外的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一八一五年拿破仑终于被“反法同盟”打败了。在七十万外国武装力量的直接干涉下，波旁王朝复辟了，沙皇俄国的哥萨克骑兵把路易十八的“地主还乡团”送回了巴黎。但是，即使如此，复辟王朝所面临的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深入人心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复辟王朝必然迅速灭亡的历史命运。

拿破仑同“反法同盟”的战争是一场反复辟的大搏斗

法国革命是对封建欧洲的挑战，在它的影响下，各国出现了革命运动的高涨。一切进步势力都热烈欢迎法国革命的新生事物，但是，欧洲的封建君主们是依靠“上帝保佑”的老古董，他们害怕新生事物，害怕革命，就象害怕瘟疫一样。老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声言，为了镇压法国革命，使她“绞尽了脑汁”。当时的沙皇政府一面用法国革命恐吓普鲁士和奥地利，以便联合起来围攻法国革命；一面趁机扩张，掠夺波兰，建立欧洲霸权。从革命开始到一八一五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他们公开支持路易十六，扬言要“恢复国王被剥夺的安全和自由”，“惩戒乱党”；他们把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复辟势力称做“法兰西民族的健康部分”，千方百计支持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武装叛乱。“反法同盟”的既定目标就是要消灭法国革命，把已经被打倒的地主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这个同盟代表了当时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它是法国保皇分子的总后台，法

国革命的最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民反对外国的武装干涉，也就是反对国内的封建复辟；只有打垮“反法同盟”，才能保卫革命，这是革命时期法国对外战争的一个中心问题。当“反法同盟”多次以大兵压境，矛头直指法国革命的时候，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必然超出一国范围，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势力在欧洲范围内的大搏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决斗。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杰出代表，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从一七九六年开始，他先后指挥了数十次战役，打败了数量上比法军多得多的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的军队，迫使这些国家的封建君主和罗马教皇在和约上签字，“反法同盟”一次又一次地土崩瓦解，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把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战争是政策的继续，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君主们在国内的基本政策就是镇压一切革命，维护封建秩序；他们把这种反动政策推行到国外，挑起了对法国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拿破仑战争的主导方面是保卫法国革命，是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部分。拿破仑自己后来回忆说：“难道这些仗是我要打的吗？难道那不是为环境所迫而造成的吗？不用说，这些战争总是过去同未来之间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敌人由于结成了长久不变的联盟，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便会被他们所征服。”拿破仑这段话用于对“反法同盟”的战争，是有一定道理的。

革命战争创造了象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赞扬拿破仑个人军事才能的著作很多，有些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木偶戏大师”，似乎，他可以凭着个人的意志把那些君主、教皇和军队象木偶一样随意扶上去，又随意撤下来。他们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拿破仑。拿破仑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胜利者。拿破仑是为维护新的社会制度而战，为法国革命而战，这是他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革命打破了封建枷锁，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军事科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提。特别是，革命改变了法国农民的地位，使千百万受奴役的农民变成了小土地的主人，他们是拿破仑战争的支持者，拿破仑充分反映了革命时期法国农民的利益和幻想，“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些，都是拿破仑取得战争胜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条件。

现代修正主义者贬低或者根本不谈拿破仑在军事上的胜利对法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他们宣扬“反法同盟”的胜利，宣扬沙俄军队是欧洲人民的“解放者”，

人以下仑革产千克国”女治重大，

恬不知耻地把那个曾经充当欧洲封建势力反革命联盟的盟主沙皇吹捧到天上去。必须指出，和拿破仑打过仗的封建皇帝和将军们，例如俄国沙皇和他的臣仆们，他们比拿破仑要落后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十八到十九世纪，拿破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是革命的；俄国沙皇之流是没落的封建阶级的代表，是反革命的，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统治，为腐朽的农奴制度而挣扎，他们是镇压欧洲革命的刽子手。例如，一七九五到一七九六年，“反法同盟”先后纠集了大小十个国家的军队来围攻法国。为了打击“反法同盟”的主要成员奥地利，一七九六年四月拿破仑率军进入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北部处在奥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拿破仑消灭了奥军在意大利的主力，严惩了法国的逃亡贵族，给当地的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一七九九年四月，俄国沙皇趁拿破仑不在意大利，派军队偷偷越过阿尔卑斯山，窜入意大利北部，在这里实行了全面的封建主复辟，广大农民重新被置于贵族阶级和奥军的统治之下。一八〇〇年，拿破仑再度率兵进入意大利，在马伦哥全歼奥军，迫使奥皇承认在意大利的改革，广大农民再次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这是历史的事实。今天有人别有用心地吹嘘沙俄胜利，说是“在三个月之内一笔勾销了法军在意大利的胜利和成果，使法国处于败亡的边沿”。（曼佛列德：《拿破仑传》，一九七三年俄文版，三三五页）沙皇干涉军的吹捧者要注意，当俄国军队进军意大利时，法国的保皇党和反革命分子在巴黎街头欣喜若狂，你们之间的感情何其相似乃尔！恩格斯研究了十八、十九世纪的许多战争，分析了拿破仑战争的许多重要战役，把欧洲的一些著名将领和拿破仑作了比较，他认为：“任何一个俄国将军，甚至连苏沃洛夫在内，都没有独创的思想”。（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恩格斯的分析完全正确，个人才能是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分不开的，在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度的条件下，效忠于沙皇的将军们对当时的进步事业不会有什么贡献；相反，他们率领军队开到哪里，哪里就是封建的反动复辟。

又例如，一八〇五到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在打破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的围攻时，曾经在德国境内大败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军队。法军所到之处，逃跑贵族，废除徭役，取消封建义务，用“拿破仑法典”代替封建的等级和特权。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这是德国历史上的“恐怖”和“黑暗”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却认为，这是德国历史上“美好时代的曙光”。（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这次战争法军胜利给德国带来的进步影响。同时又多次指出，德国的革命最终只能依靠德国人民自己来实现。拿破仑击溃普鲁士，主要是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当时，俄、奥已经联合起来，普鲁士也进行了动员，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地指向法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祈求封建皇帝

们发善心，停止对法国的进攻，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战争的客观后果之一，就是拿破仑把法国革命时期对封建贵族的恐怖政策搬到了欧洲的许多国家，从而削弱了这些地区的封建统治。参加对拿破仑作战的英国将军纳皮尔对当时的战争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他说：“法国在大陆上进行的长期的流血斗争，不是想在许多野心强国之中争得杰出的地位，也不是为了争夺领土或获得暂时的政治优势，而是一场决定贵族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占支配地位，平等还是特权作为欧洲文明的原则的殊死斗争。”贵族阶级把拿破仑看作是民主制度的“保护人”，因此，“欧洲的特权阶级一致把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深仇大恨转到他身上来了”。②

拿破仑对“反法同盟”的多次胜利，使封建君主们的武装干涉计划和复辟阴谋一时未能得逞。随着战争的胜利，法国成了欧洲的一个强国。拿破仑曾经设想在一八〇七年结束战争，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欧洲的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决不会容许法国革命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历史的辩证法是：当法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取得了胜利以后，按照资产阶级的本性，它就要求向外扩张，为资本的发展创造合适的国际环境。因此，法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不同，他们并不满足于对“反法同盟”的胜利，他们希望战争带来更多的财富，希望夺取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拿破仑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所进行的战争必然带有侵略和扩张的一面。为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和“反法同盟”进行斗争的同时，推行了资本主义的扩张政策，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拿破仑的扩张主义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七九八年，拿破仑侵略埃及和叙利亚，一八〇二年，他派兵镇压了海地的革命运动，一八〇七年，拿破仑又出兵侵占葡萄牙和西班牙。拿破仑的扩张政策，迫使埃及等地人民群众坚决抵抗，西班牙人民纷纷起来打游击，结果拿破仑就自己削弱了反对封建欧洲的力量。拿破仑的扩张政策也使得当时欧洲最大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处处发生冲突，由于对英国实行了“大陆封锁”，矛盾就更加尖锐。英国资产阶级完全站到了反动势力一边，和他们一起起来反对法国革命。拿破仑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系列的胜利使他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高处”，他幻想革命输出，以为凭几个法典就可以改变欧洲的社会，他轻视人民的力量，忽视民族的特点，引起欧洲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对他不满，成了封建君主们反对他的借用力量。列宁曾经指出，拿破仑时期的许多战争，“表现了帝国主义③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

（列宁：《不幸的和约》）人民群众反对拿破仑，是为了抵抗侵略和争取解放；英国资产阶级反对拿破仑，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互相争夺；封建君主们反对拿破

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憎恨法国革命，一心要实现反革命的封建复辟。由于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权和军队当时是掌握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手里，封建君主们就成了反拿破仑的主力军，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

一八一五年，“反法同盟”动员了将近一百万军队围攻法国，“这些反动势力打败了法国革命家，在法国恢复了……地主的统治，在数十年中扼杀了法国的一切革命运动。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资本主义终究代替了封建主义，就象今天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一样。

*

*

*

从拿破仑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对于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评论，是各式各样的，当前我们来评论拿破仑的历史活动，目的就是要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法国革命时期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表明：革命的阶级要想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反革命阶级要想复辟，往往要和国际反动派勾结在一起，路易十八就是在俄国沙皇的刺刀保护之下重新爬上皇位的。今天，法国的封建制度早已进入了历史的坟墓，但是，保皇党的复辟思潮仍然在一些角落里游荡着，今天的新沙皇正在利用这股复辟思潮为他们的反动政策开道，扮演着老沙皇的“世界宪兵”的角色，这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值得警惕的。

然而可以肯定：他们必将走进十九世纪封建皇帝的死胡同。

① П. А. Жилин《俄军在使西欧人民从拿破仑奴役下获得解放中的作用》

② 引自W·F·P·纳皮尔（英）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1850年伦敦版。恩格斯在1851年2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部书，指出纳皮尔“在评价拿破仑的军事和行政天才方面，看法非常正确”。

③ 列宁原注：“我这里讲的帝国主义是泛指对别的国家的掠夺，帝国主义战争是指掠夺者为了瓜分这些赃物进行的战争。”（见《列宁全集》第27卷，37页）

月恩的法向不希利级政加地政破大”，反对“令他满，争，”。放：拿破

李商隐的无题诗和晚唐的儒法斗争

吉林师范大学 童 新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的一员名将。他同李白、李贺一起，被称为“三李”，是一位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进步诗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他脍炙人口，流传颇广的名句。他的诗歌词采优美，意境遥深，铿锵和鸣，很有独创特色，因而为历代人民所喜爱。

但是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诗歌却被尊儒反法的政客、文人所贬低和歪曲了，特别是他的无题诗，竟被一些孔孟之徒诬蔑为“淫褻”的艳情诗，加以否定；后来的资产阶级文人承袭了这套衣钵，用胡适之流的实用主义方法，去孤立地训诂诗句表面的字样，搞什么“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借以兜售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和“人性论”，抒发他们颓废没落的感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因循了这些传统观念。

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应当洗刷儒家者流涂在李商隐诗歌上的污垢，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李商隐和他的诗放在晚唐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到：李商隐是在为主张前进、反对倒退，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尊法反儒的李德裕政治路线而讴歌，是在对牛僧儒派的倒行逆施作批判；他的无题诗根本不是什么“淫褻”的艳情诗，而是诗歌化了的法家政治。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今河南沁县）人。生活于公元八一三——八五八年，即唐宪宗元和八年至宣宗大中十二年间。他出生在王叔文、柳宗元等法家人物改革失败后的第八年。宪、穆、敬、文、武、宣六朝四十多年间，正是唐朝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由于朝廷政治腐败，“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状态有增无减，吐蕃、回纥等族的奴隶主贵族集团连年掠扰中原，已经苦于土地兼并、横征暴敛的劳动人民，又饱尝连年战祸的空前浩劫，许多地方“骸骨蔽地，城空旷野，户口存者什无三四”。支离破碎的唐王朝迅速从苟安转向崩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李商隐对唐王朝桑榆晚景的艺术写照。

社会的动荡不安，不仅使人民同统治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王叔文、柳宗元等法家人物改革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儒法斗争的结束。在李商隐所生活的时代，儒法斗争仍在继续。“纷纭排陷垂四十年”之久的所谓“牛李朋党之争”，实际上就是改革与守旧、统一与分裂、爱国与卖国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尊法反儒的进步政治家李德裕等在武宗的支持下，力图改变当时的腐败政治，企图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主张效法历代法家，“绳之以法”，实行“除弊理国行令”的改革。儒

世”，积极主张效法法家来治理国家。他写道：“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他自比屈原、贾谊，愤世疾俗，并勉励自己的孩子要学习“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在“羌戎正狂悖”的时代，应该“探雏入虎穴”而“勿守一经裘”。（《骄儿诗》）他反对宦官专权，在《有感二首》中表现了作者要求平削宦官势力的政治态度。诗人还反对封建帝王的荒淫无耻，饮酒求仙，指出“人间桑海朝朝变”，“徐福空来不得仙”。这一切都表明他是站在尊法反儒的进步人物一边的，这些诗的格调是慷慨激昂的。

但是，宣宗上台以后，牛派白敏中、令狐綯等当政，对当时主张革新的人物横加打击，斗争十分残酷。在这种形势下，李商隐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法进行战斗。他用象征的语言、隐喻的笔法，含蓄的典故，诗意的联想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自己的爱憎。诗人用楚辞“香草美人”的比兴笔法，给“无题诗”加上“巧丽”的外衣，象他自己说的“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楚雨含情皆有托”，“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此时无题是有题，这个题就是诗人直接参加的儒法斗争。

李商隐的无题诗，尽管用了很多类似爱情诗的艳丽词句，但它的主题却体现了作者坚定地拥护法家人物，憧憬改革、前进，反对复旧、倒退的政治立场。历来作为无题诗的《锦瑟》，是一首理解其他无题诗的钥匙。过去，很多注家都把这首诗作为爱情诗的代表作，宋人甚至无中生有地附会“锦瑟”“就是唐朝令狐楚的侍人”。其实，这是一首政治性很强的诗，全诗讲的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

锦瑟无端五十弦，	沧海月明珠有泪，
一弦一柱思华年。	蓝田日暖玉生烟。
庄生晓梦迷蝴蝶，	此情可待成追忆，
望帝春心托杜鹃。	只是当时已惘然。

所谓“锦瑟无端五十弦”乃是用“湘灵鼓瑟”的故事。李商隐在《七月二十八日……梦作》诗中写道：“巡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这是同样的意思。

“湘灵鼓瑟”是个神话传说，据说，古帝舜，很爱民，作过“南风”之歌。后死葬在苍梧九疑山。娥皇、女英在湘水边，曾弹瑟悼念舜。“湘灵鼓瑟”是唐人习用的典故。在诗中，李商隐不止一次把主张法家路线的武宗比作舜来悼念，如《咏史》：“几人曾预南熏曲（指南风之歌），终古苍梧哭翠华”。所谓“锦瑟无端五十弦”，是用“湘灵鼓瑟”的故事来悼念实行法家政治路线的武宗的。诗人借用“湘灵鼓瑟”表现自己的悲愤，眷恋武宗在位时的政治改革和国势兴盛的“繁华年代”——“一弦一柱思华年”。接着诗人用庄生梦蝶，是非不分，望帝含冤，悲愤不已的典故比喻武宗和法家政治家的不幸遭遇，比喻当时政局的变化。“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使用了汉魏六朝古诗中的“离合体”，合起来便是“沧海”、“桑田”（沧桑巨变）、“珠碎玉焚”。只是由于用了玉的典，在字面上便以“蓝田”代替了“桑田”，但意思是一样的。所谓“沧海桑田”，是指宣宗“一反武宗之政”的政治路线的巨大变化。所谓“月明珠有泪”（玉碎）、“日暖玉生烟”（玉石俱焚），是指改革派人物受到摧残。这结果将使唐王朝面临总崩溃的边缘。作者亲身经历过这种变化，自然地发出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长叹。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李商隐在高压之下仍然坚持法家主张，热情歌颂法家人物的政治立场。

诗人既然对唐武宗和李德裕的政治改革如此怀念，当然就会责备唐宣宗和令狐綯的倒行逆施了。下面的一首无题诗就是他对令狐綯拜相的讽刺和对自己漂泊处境的慨叹。

昨夜星辰昨夜风，	隔座送钩春酒暖。
画楼西畔桂堂东。	分曹射覆蜡灯红。
身无彩凤双飞翼，	嗟余听鼓应官去。
心有灵犀一点通。	走马兰台类转蓬。

这首无题诗应是大中四年（公元八五〇年）十月的作品，就在这一月内，令狐綯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李商隐任武宁军节度使卢宏正判官，离京而去。武宗时，李德裕为相，儒家政客令狐綯伪装起来，迎合李德裕等人的主张，但到宣宗即位以后，他便阿谀宣宗，凶相毕露，与另一些儒家人物白敏中等结合起来打击、流放李德裕，取消其政治措施。诗一开始就讲了令狐綯拜相的事。令狐綯自湖州召充翰林学士，取得宣宗宠信，经常夜里到宫中吃吃喝喝。就在同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在吃喝谈笑间令狐綯被宣宗任命为相，所以说是“昨夜星辰昨夜风”。当时名诗人赵嘏在庆贺令狐綯出任宰相诗中有“昨夜星辰回剑履（指拜相），前年风月满江湖”的句子，（见《唐诗纪事》）这里李商隐故意套用这个流传很广的很“切题”的句子，对令狐綯作了辛辣的讽刺。“画楼西畔桂堂东”指的是“含春亭”，即拜相的地点。诗人没有多着笔墨，却深刻、辛辣地勾画了令狐綯的政治投机嘴脸和宣宗的荒淫无道：一个漆黑的夜晚，在结麟楼“西畔”，翰林院之“东”的“含春亭”这个皇帝吃喝玩乐的娱乐场所，善于钻营的令狐綯，被宣宗皇帝的一阵浩荡“皇风”——“昨夜风”，卷上了宰相的宝座。这件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是指在儒家反动的政治迫害下，一些能致“天下安宁”的“彩凤”（国之祥瑞），失去翅膀，不能振翅高飞，使社会进步。虽然如此，但“心有灵犀一点通”——作者心中象点燃着“灵犀”火炬一样，透彻地明察出儒家令狐綯等的卑劣行径和嘴脸。“灵犀”是用了“温峤燃犀见怪”的典故。〔注〕李商隐进一步在诗中指出了阴谋家令狐綯是在皇帝的宫中宴会上，以“隔座送钩”、“分曹射覆”的玩艺，讨得皇帝欢心的。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尊法反儒立场的李商隐一再受到排斥、打击，这股宣宗、令狐綯尊儒反法之“风”，使诗人象无根的蓬草一样被吹得到处飘零。所以，如果说《锦瑟》是对武宗的怀念，那末，这首无题诗就是直接对宣宗和令狐綯的抨击了。

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歌颂了削藩的进步人物，表现了希望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抱负。

万里风波一叶舟，	益德冤魂终报主。
忆归初罢更夷犹。	阿童高义镇横秋。
碧江地没元相引，	人生岂得长无谓。
黄鹤沙边亦少留。	怀古思贤共白头。

头四句讲的是自己在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这也是当时革新派人物的共同写照。看来是身居蜀地，想起了三国时刘备、西晋时王濬伐吴的事，联想当年征伐淮西藩镇吴元济的裴度、武元衡等人，发出了坚决要求削藩、希冀国家统一的呼喊。张飞是三国时代刘备的大将，他在伐吴

过程中被暗杀，但是他毕竟是“终报主”，实践了刘备力图统一的路线。阿童指的是晋朝大将王濬，他的小字叫阿童。他曾东征吴，攻下吴京建业，灭亡吴国。在裴度当相前夕，有一首歌谣：“非衣小儿（裴）坦其腹，天上有口（吴）被驱逐”，是暗指裴度执政，就要征伐吴元济。“小儿”也是阿童。这里就是转借这两个典故讲讨伐吴元济的事。李商隐曾经歌颂过裴度“君得圣相相曰度”。（《韩碑》）然而这一切已成为历史，面对眼前藩镇猖獗，无人征伐的局面，诗人无限愤恨。他相信“人生那能永久没有作为”，渴望统一的局面会重新到来。为了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诗人向往革新派人士而白了头发。

在他的无题诗中，还表现了作者信仰法家思想，坚定不移、至死不悔的政治品质。

相见时难别亦难，	晓镜但愁云鬓改，
东风无力百花残。	夜吟应觉月光寒。
春蚕到死丝方尽，	蓬山此去无多路，
蜡炬成灰泪始干。	青鸟殷勤为探看。

尊法反儒的进步政治家李德裕，于公元八四九年正月被贬为崖州（即琼州、琼岛，海南岛南部）司户，其他一些革新派人物也被流放各地，天涯海隅，当然相见是极其困难的。李德裕到崖州以后曾寄回过一首《望阙亭》的诗，其中有“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的句子。造成革新派人物流放各地的原因就是“东风无力”，东风指君主，百花喻改革派的优秀人物。在这种政治高压下，诗人怀抱不变的志向，他“深知身在情长在”，（《暮秋独游曲江》）表示要与自己的同伴休戚与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法家人物不惧“言发祸应”、“计行身戮”，敢于牺牲精神的形象写照。正因为有这样坚定的信念，尽管形势很不利，阴气袭人，诗人还是充满了信心，寄托着希望。“蓬山”也就是“琼岛”，这里所谓的“蓬山”正是暗指“琼州”，既是指李德裕被贬的崖州，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这些革新派人物所共同怀念的地方。“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这里泛指音信。虽然大家相去甚远，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青鸟殷勤为探看”，同伴之间应当互通信息，相互勉励。

通过剖析李商隐的无题诗，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那种脱离政治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是根本不存在的。

李商隐的无题诗是他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李商隐虽然力图改革，但是作为地主阶级的诗人，他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圣相”身上，找不到什么根本出路。无题诗产生在改革派受压的时代，调子比较低沉，又比较隐晦。正象鲁迅先生说的：“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李商隐死后不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巢起义，农民革命战争的洪流冲毁了唐王朝，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而李商隐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一点的。

〔注〕：据《异苑》载：“晋温峤至牛渚汎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多怪物，及燃犀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

简论刘禹锡和他的政治诗

北京师范大学五七干校理论组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经过“安史之乱”八年洗劫之后的中唐时期，是一个政治腐败、危机四伏的时代。在朝廷内部，宦官掌握兵权，把持朝政；从长城以外到淮水之滨，一个个挂着朝廷“节度使”招牌的地方军阀各霸一方，世代相袭，形成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大地主保守派官僚、宦官和藩镇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他们时而互相争夺，时而互相勾结，严重地削弱中央集权，破坏国家统一。

大地主保守派官僚、宦官和藩镇之间的你争我夺，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争夺剥削人民的权利。因此，在不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必然激化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

公元八〇五年，即唐顺宗李诵在位的永贞年间，一场由王叔文、王伾（pī音披）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革新运动开始了。三十四岁的刘禹锡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柳宗元等一道“参与谋议，草拟文诰，采听外事”。他很高的政治才能“尤为叔文知奖”，认为他“有宰相之器”。他和柳宗元发表的意见很受王叔文的重视，这样，他们在不满五个月的时间里，在政治上打击了大地主保守派起用被排斥的陆贄等人；夺回落在藩镇手里的盐税管理权；取代宦官对中央禁军的控制；下令取消一些额外的苛捐杂税，并挫败了藩镇势力韦皋妄图干涉朝政的活动。据史书记载，革新期间，长安城里，“市井讙（欢）呼”，“人情大悦”。

但是，由于“永贞革新”冲击着反动势力，引起他们的极端仇视，他们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扑。由韦皋为代表的藩镇势力发难，以宦官俱文珍领头，大官

僚郑絪、卫次公紧密呼应，一步一步地迫使顺宗内禅，拥戴宪宗登位，使这场刚刚兴起的革新运动很快地失败了。残酷的政治迫害随着到来。王叔文被杀害，王伾被逼死，刘禹锡等八人被分别贬谪到边远州郡作“司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此后，刘禹锡一直辗转于朗州、连州、夔州的巴山楚水之间，直到宪宗、穆宗死后，才回到内地作刺史。晚年在洛阳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清闲职务，终年七十一岁。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革新的失败，长期的贬谪生活始终不能动摇刘禹锡的革新立场。他在临终前的《自传》里，仍然以“信道不从时”的反潮流斗争精神，坚持“永贞革新”“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的观点。面对种种的责难、诽谤乃至迫害，他非常自豪地宣称：“人或讪兮，心无疵兮！”

刘禹锡不仅是政治革新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家，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所参与的政治革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刘禹锡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他的哲学代表作《天论》三篇，和柳宗元的《天说》相配合，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战斗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提出了“天人交相胜”的法家理论，对韩愈宣扬孔孟道统、鼓吹“天命论”的反动说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韩愈死后，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还提起这场论战，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表现了他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

刘禹锡的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战斗的思想内容，雄浑爽朗的艺术特色。他的诗，尤其是他的政治诗篇是他所实行的政治路线的艺术体现。抨击地主阶级保守派大官僚、宦官和藩镇等腐朽势力，坚持革新，坚持统一，热情地讴歌前进的历史潮流，构成其政治诗篇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读起来，还可以感到振人心弦的战斗气息。

我軀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刘禹锡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虽告失败，但是，他对官僚大地主保守派、宦官等腐朽势力的蔑视和憎恶，仍然通过战斗的政治诗篇鲜明地表现出来。

对于“政出权道”的黑暗政治，刘禹锡坚决主张革除；对于“荣势足以破理”的“权幸之家”，刘禹锡坚决予以揭露；对于“擿（tì音惕，揭发）奸犯豪”的斗争精神，刘禹锡热烈加以颂扬。这样，刘禹锡被当朝权贵污蔑为“挟邪乱政”，被贬远地，虽遇“恩赦”也不在“量移”之列。斗争的实践磨炼了诗人的笔锋，使之成为刺向把持朝政的恶势力的锐利武器。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以咏物诗的形式对那些虫鸟似的政治小动物投以最大的轻蔑。在《飞鸢操》里，他借骄横跋扈的鸢鸟形象尖锐地讽刺了那些反对“永贞革新”、把持大权、复旧倒退、妒害贤能的反动人物：“鹰隼（sǔn音笋）仪形蝼（lóu音楼）蚁心，虽能戾（lì音利，到达）天何足贵！”意思是说，别看它很象老鹰的样子，可是他们的心却是象蝼蚁一样的渺小而可鄙；在《聚蚊谣》里，他更把那些反动人物比作嗡嗡营营的吸血小虫，一针见血地写道：“我躯七尺尔（群蚊）如芒（尖端，指极微小的东西。），我孤尔众能我伤。”政治上的“群蚊”在革新派人物的“七尺之躯”面前显得更加渺小和虚弱。“清商（指秋风）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伺丹鸟”。搞倒退的人尽管他们喧嚣一时，但有如秋后的蚊子，活不长久了。一个“羞”字，表明了他对政治群蚊的极大轻蔑。

“永贞革新”失败后的第十个年头的春天，刘禹锡和柳宗元同行从湖南回到长安，目睹京都的变化，回忆当年搞革新的情况，使诗人感慨万端，借游玄都观（guān，音贯，道教庙宇）看桃花的事，写下了七绝《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以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比喻那些在“永贞革新”失败后窃取了要职的保守派们那种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丑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腐败的政治局面。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由于这首诗“语涉（关连）讥刺”，引起“执政不悦”，刘禹锡又被贬为连州刺史。十四年后，刘禹锡再度回到长安，重游玄都观。这时观里的桃花已经不见了，种桃的道士也不知哪儿去了，诗人又写了一首“七绝”，以更辛辣的口吻，再借桃花嘲笑那些一时炎势赫赫而又转眼消失的“桃花”，同时也抨击了他们的扶植者和支持者，再一次以傲然的姿态显示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反对藩镇割据，坚持国家统一，这是刘禹锡一贯的政治主张。在不少诗篇

里，他以强烈的爱憎，讴歌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鞭挞破坏国家统一的罪行，始终不渝地站在削平藩镇的一边。

公元八一七年，即宪宗李纯元和十二年，在宰相裴度亲自统帅下，将军李愬攻占蔡州，平定淮西，俘虏彰义军节度使吴元济。这一胜利，是对藩镇割据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远在连州的刘禹锡兴奋地写下了《平蔡州》三首，其中第二首说：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
路旁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与涕零。
老人收泣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蔡州这块地方，在封建割据势力的盘踞下，已经四、五十年成为中央无法管辖的独立王国，听不到朝廷的声音。这次由于朝廷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派遣军队在一个雪夜里突然成功地进入蔡州。这首诗写的就是这件事。诗人以蔡州父老的亲身感受，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愿。

继平定淮西之后，八一九年，削平了占地最广、拥兵最多、子孙相传达五十四年之久的淄青镇，盘踞河朔三镇的三个节度使，也急忙地上表朝廷，表示降服。至此，全国暂时归于统一。诗人更以“耕夫满野行人歌”（《平齐行》）的诗句欢呼前所未有的打击藩镇势力的胜利。

诗人在歌颂国家的统一的同时，对于那些心怀野心的“号称藩臣，实非王臣”的藩镇头子称之为“妖童”，视之为“孽竖”。他的《城西行》一诗充分表达了对他们食肉寝皮的刻骨仇恨。在叙述了对这些“叛族”的处决之后，诗人写道：“城西人散秦街平，雨洗血痕春草生”。形象地说明了，只有对这一小撮心怀野心的“叛族”坚决镇压，才能“克振皇纲”，实现“四海为家”的统一局面。

但是，这个统一是暂时的。朝廷中，皇帝荒淫无度，宦官和守旧官僚互相勾结，藩镇乘机而起。“目览千载事”、“忧国不谋身”的刘禹锡，总结历史教训，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元八二四年，他写了一首怀古诗《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今湖北大冶县东），“踈峭临江”，是三国时东吴江防前线的要塞之一。东吴末代王孙皓在江中用铁锁修筑拦江工事，以求凭借天险，负隅顽抗。公元二八〇年，西晋武帝司马炎命琅琊王司马伷带领大将杜预、王浑、王濬（jùn 音俊）率水陆大军二十万伐吴。当时益州刺史王濬造楼船（战舰），率水师，出益州，沿长江而下，摧毁千寻铁锁的江防，一举攻下建业（即诗中的“金陵”，今南京），孙皓出降，东吴灭亡。中国又重新统一。诗的前四句，写的就是这一史实。诗人凭吊古迹，回顾东吴灭亡的历史，联系眼前的现实，抒发自己的感情。指出：山河依旧，形势已变。如果在四海为家、天下统一的历史潮流面前，还是占地为王，大搞分裂，那就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当年盘踞一方的东吴所凭借的工事（故垒）不是那样萧条、冷落，成了历史的陈迹了吗？这首诗是对当时骄兵悍将提出了历史的警告，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还有一些诗篇是他丰富的斗争实践和生活体验的结晶，具有较高的艺术概括力量。他并不停留在表面的生活感受上，而是通过这些感受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启示，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例如大家所熟知的一首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是他在巴山楚水渡过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之后，在衰老之年回到内地时写的一首诗。三四两句写的是旧地重来，怀念战友，产生的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但是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力求从事物新陈代谢的必然过程中，看到一种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力量。在五六两句中，诗人虽然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自己象一只沉舟，从生活的激流中退到岸边，象一棵病树，不可能再同其他树木那样欣欣向荣。但更重要的是，诗人看到千帆在激流中乘风前进，看到万木在春天里蓬勃生长，仍然是期望前进和新生的。因此，在结尾两句中，努力克服自己的衰颓之感。

他的生活态度是乐观的。

他还有一首《始闻秋风》：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
五夜飕飕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诗人在这里也同样力求振作精神，有所作为。五六两句写得苍劲有力：伏枥回乡的老马还想重返疆场；倦睡已久的雄鹰还盼望再飞上青云碧霄。诗人那种不服老的斗争性格跃然纸上。读了这首诗，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法家曹操的名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但是，刘禹锡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不仅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危机的根本办法来，而且，他政治革新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他的思想倾向虽然是法家，但没有完全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不彻底性。他的作品，也流露出不少封建士大夫消极低沉的思想情绪。这些都是刘禹锡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永贞革新”失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一步恶性发展，对人民的剥削尤为严重。在刘禹锡死后三十余年，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他们高举“冲天”、“平均”的大旗，横扫中州，长驱岭南，浩浩荡荡开进长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唐王朝土崩瓦解了。

中唐时期离我们已经一千多年了。今天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阶级斗争中重温中唐这一段历史，联系刘禹锡一生的斗争经历，读一读他的政治诗篇，仍然会给我们以不少有益的启示。集中到一点，祖国的统一安定，人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一切主张倒退，主张分裂的反动派，到头来总是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所吞没。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

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

以革命精神学革命经验

北京大学 柏 文

当前，我们北京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响应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出的“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战斗号召，正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掀起了一个学习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

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是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在教育领域里涌现出来的又一个光彩夺目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路线的生动实践，是教育阵地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对几千年来旧教育制度、传统的私有制观念的深刻革命。这个具有战略性的经验，对于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对于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对于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就体现着教育领域“运动的未来”，它为我们这条战线的继续革命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前景。我们要学习他们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习他们坚持教育紧密地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学习他们把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一切着眼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习他们坚持大破因循守旧，敢想敢干、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们坚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改造和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学习

他们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等等。学习朝阳农学院的这些先进经验，可以促使我们解放思想，开阔思路，放宽眼界，加大步伐，在教育革命的大道上更加奋勇前进。

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首先要扫除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各种思想障碍。那种认为朝农的经验“只适用于农业大学，而不适用于综合大学”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对朝农经验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精神实质缺乏正确认识的表现。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朝农的经验正是从根本上抓住了这个原理。因此，它对于我们综合大学也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的教育革命如何更好地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如何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服务，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农村阵地作出贡献？我们难道不可以从朝阳农学院的经验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吗？对于那些抱残守缺，不愿开门办学，甚至一心想走回头路的人，难道不应该大喝一声、击一猛掌吗？

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是一场触及人们世界观的深刻革命。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没有彻底打破一切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的高屋建瓴的气概，没有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朝农的经验是学不到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我们要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批判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因循守旧思想和懒汉懦夫世界观。要粉碎束缚我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打破各种旧框框。在学习朝农经验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地总结我们的工作，肯定成绩，找出差距。订规划时要敢想敢干，敢于想大的，敢于干大的，敢于动大手术，而不能搞修修补补；要迈出大步子，而不能象“小脚女人”似的踟蹰不前。

让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朝阳农学院为榜样，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努力搞好学习、批判、总结、规划，大干大变，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为创办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而奋斗

辽宁朝阳农学院党委书记 徐 明

我们辽宁朝阳农学院，是一九七〇年五月，由原沈阳农学院迁往朝阳部分，和朝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朝阳水利学校、农业学校等四个单位合并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一九七三年改称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现在设有农学、果林、畜牧兽医、农田水利、水工建筑、陆地水文等六个专业，在校学生一千二百人，教职工三百二十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舞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出现了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五年来，在省委、地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办学，实行社来社去，几上几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为我省打好农业翻身仗服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农业大学必须到农村去办

农业大学办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但是，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沈农，硬是赖在沈阳不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广大贫下中农，脱离生产实际。学校成了修正主义的染缸，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的学生，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学农不会农。农学院走进了死胡同。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这个部门，已经阻碍和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是旧沈农的当权派之一，当时对毛主席的批评没有认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场大革命，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我从沉痛的教训中得出一个结论：象旧沈农那样的学校，说啥也不能再办了。十七年的错误，最根本的，就在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没有按照毛主席教育革命指示办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亲自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全国解放后，对按照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教育传统创办起来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毛主席给了高度的评价，表示完全赞成。新型社会主义农业大学怎么办？我们感到，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去，创办毛主席完全赞成的学校。

一九六九年底，省革委会根据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决定沈阳农学院分散到农村办学，农田水利专业搬迁到朝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师生，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开了誓师大会，决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创办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大学。当时，已经临近春节，广大师生说：时间不等人！大家提出：“战三九，胜严寒，下农村，同贫下中农一起过大年。”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师生们连同教职工家属一起，在阴历腊月二十五，来到了朝阳的偏僻山村——北四家子公社插队落户，办科教基点。

知识分子一到农村，走上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马上受到了热烈欢迎。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文化大革命，你们哪能到这儿来！”大家看到贫下中农这么欢迎，很感动，有的同志大年初一，就同群众一起挑沙子垫地，改良土壤，投入了

学大寨运动。

学校搬到农村后怎么办？是简单的大楼搬家，仍然按旧沈农的路子办学，还是根据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办学？根据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教导，省委明确指示我们：要紧密结合农村实际，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为打好农业翻身仗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广大师生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我们在科教基点办起了科学实验队，宣传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搞科学种田，结果当年粮食产量由头一年的二百多斤一下就上了《纲要》。懂果树的同志帮助群众管理果园，苹果产量当年就翻了一番。为了使更多的人学习，还办了夜大学，学政治，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唱革命样板戏。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很快，缺教员，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去教小学，教中学。还开办了各种短训班。即使这样，很多地方、很多人仍然不能来学习，我们就把先进经验制成展览图片，拿着实物，穿山越岭，为贫下中农送教上门。当时大家想的是：农村需要什么专业，我们就办什么专业；学制要长就长，要短就短。群众称赞说：“农大师生斗志昂，露天野地当课堂，送教上门全靠走，大学办在腿肚子上。”

农业大学从城里搬到农村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遇到了资产阶级偏见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们刚搬到农村时，有的同志说：“下来一无校舍，二无设备，接受再教育可以，办学可不行。”有个教师，下来后在思想改造上可以说很“刻苦”了，坚持参加劳动，在短训班里上课也特别认真。可是说这叫办大学，就想不通了。还有个别的人说：“到农村分散办学，把学校搞乱了。”所以到一九七〇年五月，地委决定几家合并，成立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时，一些思想不通的同志错误地认为：这回可有个头了，要回城办“正规”大学了。

这时，我们打算通过总结到农村几个月的体会，巩固在农村办学的成果，坚定扎根农村的决心。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我们在喀左县召开有全体党员和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前半段开得还不错，后半段领导同志找差距时，就“炸锅”了。有人说：“在农村办科教基点，是别出心裁，独一份，这叫教育革命？”有的要求把分散在各基点的人都集中起来，搞辩论。而且这些思想又突出地反映在领导班子里。领导班子里发生了分歧，会议就开不下去了。

不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群众中的问题就根本没法解决。当时，我们让各点的群众代表先回去学习讨论，领导班子留下来，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重新学习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毛主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大多数领导班子成员认识到，农业大学到农村办，这一步走对了，我们就是应当带领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结合的道路。但教育革命到底怎么搞，大家在思想认识上还不统一。我们经请示地委批准，领导班子成员和群众代表又一起到大寨、河南岳滩等先进单位学习。

地委指示我们：你们培养的学生要能学大寨，那质量就比旧农学院不知高多少倍。我们到大寨一看，大寨真是一所最好的农业大学。我们就应当把农学院办成大寨这样子。同时，还看到了农林科学院在大寨的“五·七”服务队。这下子和我们办的科教基点对上了号，感到这不是“独一份”，而是农林院校、科研单位所必须坚持的方向道路。

在岳滩，我们看到了一个大队办的农学院，很受欢迎。这个农学院的学生，真是政治思想、劳动、技术“三过硬”。不少省、地都请他们的学员去当顾问。一个大队的学校能办得这

么好，我们的一个科教基点有那么多人，怎么不行呢？这时，大家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要求：“赶快回去干吧！”还有一部分同志又去了江西共大，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

领导班子回来后，立即组织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旧沈农。革命师生发出了钢铁誓言：“**举抗大旗，走共大路，誓叫农大变共大。**”并且把它写到了学校后面的鹰嘴山上，表示我们办毛主席完全赞成的学校的坚强决心。

教育革命又出现了新的热潮。各科教基点在很短时间里，就办了各种专业短训班五十六期，培训了六千多人。建平县万寿公社五十二岁的老贫农王贵彬，人们都叫他“王大学”，就是这个时期办的分段学习班的一个学生。他对能到大学学习，感受特别深。他讲：“要不是毛主席叫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五十多岁的人，文化又低，那能上大学。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他逢人就讲自己上大学的体会，遇会就颂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不识多少字，但对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体会得很深，对旧的教育制度非常痛恨。他说，过去是你教你的书，我种我的田，培养的学生怎能为贫下中农着想，今天我念大学一定要为毛主席的教育路线争光，为农业学大寨服务。人们都说王大学念书念出了无产阶级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末，根据省委的指示，地委决定，我们在各县的科教基点下放给县，与各县“五·七”农大合并。这样，地县两级都办起了“五·七”农大。公社办“五·七”中学，大队办科学实验队，在全区初步形成农业科学教育网。学校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我们决心做到，朝阳地区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全区三百万人民都是我们的老师，又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全区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水、林田就是我们教学、科研的广阔天地，为人民服务的战场。

这几年的斗争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农业大学办在哪里，不是个简单的地点问题，而是一个路线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农业大学从城里搬到农村，使农学院和农村三大革命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使农大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战略措施。农业大学要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为农业服务，就必须搬到农村来。这是办好社会主义新型农业大学的起点。

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根据农村三大革命的需要，省委指示我们，不仅要办好短期班，同时也要办好长期班，为农村社队集体经济培养各种人材。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们又开办了三年制的专业长期班。

长期班怎么办？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旧沈农的毕业生，到农村第一线的很少，更没有一个当农民的。北票县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我心里有个疙瘩，我们挑好样的送上大学，送一个走一个，上了大学就不愿回农村了。难道农村就不需要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接班人吗？”他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去干什么？这不单是个去向问题，而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我们是农业大学，根据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就应当从农村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入学，到学校学几年，大学毕业后又回去当农民，挣工分。但是，有人却说：“念完大学还当农民，谁来？”到底有没有人来？几年来招生的实践说明，确实有人不愿来。那些想把学校当成离开农村向上爬的阶梯的人不愿来，那些“望子成龙”的人不愿叫子女来。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学校不是给这些人办的！我们就是要拆掉这个资产阶级的阶梯。

那么有没有人愿意来呢？实践告诉我们：有！而且是大有人来。我们每到招生的时候，常常是招满了，都开学好几个月了，社队干部还亲自带着学生来入学。学校附近的一个大队，

听说学完还回去，说啥也要多送几个。我们说，现在吃住安排都有困难，明年再来吧。大队的同志说什么也不行，他们讲：“学校没住处，住家里；吃饭有困难，自己带；教室坐不下，窗外听！”邻近省、盟的一些社队知道了，也往这里送学生。我们到农村征求意见的时候，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这样的学校应当大办、多办、快办！这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深远意义，它反映了亿万工农兵的强烈愿望，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学校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存在着两种形式。农村主要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农业大学，必须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服务。不然，势必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资本主义复辟帮忙。

毛主席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朝阳地区有一千八百多个生产大队，一万四千多个生产队。到一九八〇年，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种专业人员就需要十万人。我们办农业大学的，就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离开广大农村，离开贫下中农，离开三大革命需要，农业大学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大学毕业当农民，直接违反了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教育传统，触及到人们的思想。有人说：“这叫什么大学？是浪费人材，误人子弟。”在一九七二年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人把“社来社去”、“半工半读”、“几上几下”统统归之于“极左路线的产物”，是“超阶段”的“空想共产主义”。但是，历史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凡是符合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事，就要坚持下去不动摇。我们党委一班人又坐下来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三个指示。用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一条一条地对照几年来走过的道路。讨论时大家说：我们明明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的，怎么成了极“左”路线的产物呢？怎么会变成“超阶段”的“空想共产主义”呢？恰恰相反，我们不是做过了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贫下中农的要求，我们还差得很远，还得加劲干！广大师生在学习中劲头更足了，说：我们就是要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唱对台戏！师生们重新粉刷了后山上“誓叫农大变共大”七个大字，以表达我们办好毛主席完全赞成的学校的钢铁信心。

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为了保证社来社去的实现，我们从教学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上都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改革招生制度和办法。

在招生时，我们动员广大师生深入社队，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学生和家反复宣传学校的办学路线，把立志当一辈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找报名的学员个别谈话，办学习班，思想通了的，态度坚决的，就可以入学。

我们的学生到学校来学习不带户口。学生认为自己还是生产队的人，生产队也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社员。

二、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从始到终进行扎根教育。

旧沈农，学生一入学，就搞什么“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农学家”，开学典礼时把教授介绍出来，以此为诱饵，给学生的思想打上成名成家的烙印。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学生入学的第一课，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向大家宣讲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赠送马克思列斯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小册子，发给劳动工具，让学生在思想上深扎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根子，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转变学生思想，主要是帮助学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教导，组织学员定期回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首先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践。每年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组织师生到农村先进社队参加政治运动，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学会抓阶级斗

学
施
会
坚
产
术
众
业
“
队
接

争，抓路线斗争。我们的农业大学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三、把学大寨做为基础课。

“农业学大寨”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根本方向。旧沈农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不过问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只是闭门读书，培养的学生轻视劳动，害怕艰苦，不愿下农村。我们今天决不能那样办了。我们是把学大寨做为基础课。按照大寨的道路建设我们的学校，并把学大寨做为检验、考核学生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把学大寨做为基础课，就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亲身参加学大寨的斗争实践。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勤工俭学的教导，在办学过程中是“先上马，后配鞍”，边招生，边建校，没有房子自己盖，没有土地自己开。从建校到现在，仅校部三个专业盖房三十多间，垫地造田二百亩，闸沟造地六十多亩。一九七二年产粮六万斤，一九七三年产粮十六万斤，一九七四年产粮二十六万斤。我们决心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粮、菜、油、肉、经费五自给。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的原则问题。马克思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通过学大寨的艰苦创业劳动，使师生学到了学大寨的本领，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认识到热爱劳动是继续革命的一个根本条件。

四、打破“三中心”，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

我们学校每个系都结合本专业的特点，自己动手，建立三结合的学大寨基地。把学校办成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科研所，也是一个生产队。农学系有实验田、种子田和高产田一百五十亩；果林系有两千七百棵果树的果园；畜牧兽医系办了猪场、兽医院、配种站。农学系师生共同组织三结合课题组，边生产，边研究，边教学。每个人既是学生，又是工人，又是实验员。学生半工半读，教员半工半教，又向学员学习。打破年级界限，新老生互教互学。这种组织形式，有利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有利于培养学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学习运动的开展。例如朝阳地区花生面积逐渐扩大，研究花生没有人，我们就派两名学员到山东姚世昌同志那里去“留学”，学了几个月回来就干，以两个学员为主，组成课题组，又讲课，又搞研究，也指导生产。刘广义同学搞的六亩地花生，单产四百二十斤，其中最高亩产五百六十斤。创造了朝阳地区花生高产纪录。如果没有为革命而学的明确目的，没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怎能干出这样的成绩来呢！什么叫质量，这就是我们的质量！

五、实行“几上几下”，分段教学。

吸取分段教学班的经验，对于三年制的长期班，我院规定了一年级学生基本上在校学习，二、三年级学员每年都有一定时间回队实践的制度，叫“几上几下”。“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几上几下”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措施。学生回队实践，是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极好机会，每回队一次，思想就有一次新的提高。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上大学是阶级的培养，坚定了扎根农村的信心。“几上几下”也是教学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改革，它促进了教学和生产劳动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学员带着改变家乡面貌的课题来学习，又把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带回家乡去实践，每个学员的家乡都成了学校的一个科教基点。他们在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受到了全面锻炼，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学习期间就对农业学大寨做了贡献。据一九七四年不完全统计，农、林、牧三个系二百八十九名学员，在“几下”期间，就为社队举办了二百多个短训班，培训了三千一百多名农民技术员，协助社队组织了七十二个科学实验队，和贫下中农一起搞了七千多亩试验田、制种田、高产田，嫁接果树五十三万株，治疗病畜二万四千多头。学生通过几上几下，直接参加农村三大革命实

践，已经成了农业学大寨的一支突击力量。几上几下，把学校和社队紧紧地拴在一起，使教育冲破了学校的小天地，打乱了旧的教学秩序，同时又把教学与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农村的根子越扎越深，心和贫下中农越贴越紧。学生说：“社来社去是方向，几上几下是桥梁。”

经过这些根本性改革，使学员“进得来，回得去”。我院十九名首届毕业生已于去年一月愉快地回到了家乡社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对那些怀疑派做了有力的回答。王文有同志是北票县黑城子公社送来的学员，毕业后回到家乡，立即投入批林批孔战斗。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对推行“四定一奖”（定地块、定产量、定人员、定报酬，超产奖励）不满，他就在党员大会上对“四定一奖”进行批判，指出它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倒退。他的发言得到了广大党员的拥护，他们说：“文有，讲得太好了，你说出了我们憋了好久的话。我们坚决支持你！”但是他的发言也遇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说他是出风头，“上了几天土大学就不知道姓啥了。”王文有同志不管这些讽刺、挖苦，在大会小会上领着社员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修正主义毫不留情。喀左县南公营子公社毕业学员张跃臣，回家乡后，遇到了家庭和社会上的各种阻力。他妈妈托人给他找了一个工作，每月挣几十块钱。张跃臣非常坚定地对他妈妈说：“我去做工挣钱，的确能使我们一家生活富裕点，但贫下中农送我上大学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改变农村面貌，我就是要在这一扎根，要使全公社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富裕起来。”这批学员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决裂”。他们坚持扎根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两个划时代的任务：一个是改造旧的国家机构，一个是对农村进行文化工作。列宁同志说：“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可见，培养新型农民，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当前，农业战线展现出的大跃进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农业大学为社队培养大量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农大毕业当农民，这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即使那些所谓的“教育家”者流，死抱着“学而优则仕”不放，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深入批林批孔，发展教育革命成果

社来社去，当农民，挣工分，农、林、牧三个专业行，水利专业行不行？面向地区的行，面向全省的行不行？一九七三年水利专业准备全省招生后，这个问题又成了争论的焦点。在制定教育计划的时候，有人提出：水利专业是面向全省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县以上”，不能搞社来社去；要加强基础理论课教学，不能搞半工半读；水利专业特殊，不能搞几上几下。等等。

经过几年教育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委的同志们认识到，说啥也不能回到十七年旧沈农的那条路上去。为了顶住这股歪风，我们提出了“四个坚持”：坚持社来社去，那来那去；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坚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坚持几上几下。但是党委的意见一到水利系总支就卡壳了。一个教育计划，就这样上上下下搞了几个月，到开学了，还没定下来。正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我们以领导班子为重点，解决路线是非问题，通过批判“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使我们认识到，摆在面前的这场斗争，是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列宁同志指出：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嚣张一时的‘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现在又有人出来哭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哭旧沈农，哭修正主义的一整套教育路线。

在这场斗争面前，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绝不能有半点动摇。我们党委带头狠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孔孟之道，狠批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的十七年，向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展开了主动的进攻。接着，又组织师生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上阶级斗争课，带着学校里争论的问题，一边批林彪、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一边搞社会调查。广大贫下中农说：“社来社去，几上几下的学校，太可咱们的心了！谁要说它不好，叫他到我们这儿来辩论！”贫下中农这种强烈的感情，对师生们教育很深。

全院广大工农兵学员，越狠批“学而优则仕”，对社来社去的认识越深刻。纷纷写决心，发誓言，坚决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水利系学员贾惠珍，原是来自水利工地的工人，刚入学时对社来社去想不通，一度想退学或转到别的学校去。在批林批孔和搞社会调查中，她提高了路线觉悟，她说：“当工人固然是革命的需要，但是，农村更需要我，我也更需要农村！”她向党组织写信表示，决心和“学而优则仕”彻底决裂，毕业后到农村去当一代新农民。目前，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面向全省招生的水利三个专业的广大学员，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驳斥水利三个专业不能社来社去的种种说法。他们狠批唯心论的先验论，坚决打破“老三段”，把学大寨做为基础课。

几年来的反复斗争，使我们认识到：农业大学实行社来社去，学生毕业后回队当农民，挣工分，这是由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转变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场革命，是把学校由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一场严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要是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没有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要是没有坚强的党委班子也是不行的。这几年我们党委就有这么一个体会：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办。具体说来，就是抓路线，学、批、干。

“学”，就是牢牢抓住对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学习不放，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我院就是靠毛主席三个指示创办起来，成长壮大的。当有人说我们学校分散办在农村，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时，我们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坚持在农村办学不动摇。当有人攻击我们学校不象样子时，我们学习三个指示，永举抗大红旗，坚持共大道路，教育革命不迷航。当我们队伍中出现分歧时，我们就举办学习班，坐下来学习毛主席三个指示。看革命领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做对了就坚持住，做错了的就马上改正。有了这一条，我们行动就有了准则，有了统一的基础，有了方向。

“批”，就是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共产党的斗争哲学。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解放后教育战线的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十七年，不批十七年的旧教育，教育革命就寸步难行；不批十七年的旧教育，资产阶级就要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葬送。因此，批判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教育革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内容。

“干”，就是实践，就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毛主席不但为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而且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我们有了抗大、共大的榜样，又有了十七年的反面教训，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斗争中实践。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几年来，我们就是在学中批，批中学，批中干的，不干就是假学，假批。不干，教育革命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新型农业大学，就是这样学出来的，批出来的，干出来的。

朝阳农学院新闻剪辑

同志，你去过朝阳农学院吗？在那所无产阶级的新型大学里，新人新事可多啦！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几个采访的片断。

睡土炕的党委书记 热爱劳动的教师队伍

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叫徐明，他带头到农村安家落户，全家都从沈阳搬到了朝阳的山沟里。几年来，他以身作则，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至今还是同干部、教师住一样大小的房子，睡的是土炕。

老教授龚畿道也已在朝阳山沟里安家落户啦。他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当地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呼他“老龚头”。

在朝农，很难分出谁是教员，谁是学员。这里的教师卷起裤腿能下田，拿起粉笔能讲课。有一次我看到一队挑粪桶的女同志，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知道这是农学系十一名女教师自动组成的“三八”创业队，她们在为打农业翻身仗作贡献。这支“三八”创业队的同志，平均年龄三十九岁，大多数都有家庭负担，但她们克服困难，起早贪黑，星期天也不休息，从创业队成立以来，她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已积优质肥四十多方。

挣工分的大学教师

你听说过大学教师挣工分的事吗？朝阳农学院去年的首届毕业生中，就有五个同志留校当了挣工分的教师。

他们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在两条教育路线激烈斗争中，敢于同旧思想、旧习惯势力斗。有人瞧不起他们，不承认他们是正式大学教师，他们毫不动摇，坚定地说：“我们能当第一代新型农民教师，无尚光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最有力的批判！”

这些教师虽然留校工作，但仍然和生产队保持密切联系，坚持抽一定时间回队参加生产劳动，脏活累活带头干。十个月来，每人都劳动了一百五十天左右。现在，他们都担任了教学任务，登台讲课，并开展各种科学实验活动。叶面固氮菌研究，在国内外都被认为是难攻的“尖端”，而他们大胆实践，敢于创新，坚持试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们还创造了小

麦、高粱、玉米间复套种亩产一千八百八十七斤的高产纪录。

未出校门的社、队干部

一九七二年初，朝阳县十二台子公社南大营子大队送赵忠同志到朝阳农学院学习。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和政治思想教育，赵忠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今年春天，公社准备抽小赵去做林业干部，小赵说：“我受贫下中农委托上大学，大队面貌没改变我怎能离开？”大队党支部看到小赵在农村“铁”了心，是个好苗子，就决定让他担任团总支书记。小赵勇敢地挑起了这个担子，在回队实践中，紧紧依靠党支部，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大搞科学实验，成了党支部的得力助手。

在朝农，未出校门就当上了社、队干部的何止赵忠一个人？有的同学回队实践时就协助队长做工作，大伙叫他不是队长的队长；有的同学被公社党委派到一个大队去蹲点，当接班人培养；有的已被推荐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这些青年，是学员，是社员，也是干部，他们在校期间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缺少的人材。

毕业生的礼物

要毕业了，给学校留下什么“礼物”呢？

农学系的同学们感到，要实现“五自给”，就要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于是他们挑担，推车，备料，垫土，砌砖，修建了一排十大间的猪圈，并在上面写下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八个大字。

果林系同学，分头深入社队，收集贫下中农管树种树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体会，编出了一本乡土教材。他们说：“知识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要把学到的知识还给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心意。”

牧医系的同学，早晚不停，搬石拉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修好了一块大寨田。

这同旧农大学生在毕业时写下的那些预祝当“工程师”、“农学家”的留言，留下的那些大镜子一类礼物，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手举红旗的一代新人

在最近召开的学习朝农经验的现场会上，人们都在传颂朝农毕业生王文有同志的先进事迹。我一听，确实不简单，看到这样好的接班人，怎么不叫人打心眼里高兴呢！

王文有同志在校期间，就和贫下中农一起搞过八种作物栽培试验，高粱亩产达到一千九百五十斤，花生由亩产一百斤提高到四百九十九斤，贫下中农都称他叫“未出校的技术员”。毕业后，王文有回队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他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不仅大搞科学种田，而且首先狠抓农村里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他听说公社有的领导人主张搞“四定一奖”，

把生产队的土地、车马、工具都分到小组时，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在搞倒退！在一次公社召开的党员干部会上，他严厉地批判了这种错误做法，并尖锐地指出：“究竟要把社员领到北京还是莫斯科？”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有些人说：“这‘四定一奖’是研究过多次的经验，怎么能批判呢？”还有个别人讽刺王文有：“这只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念了几天大学竟不知道姓啥了！”但王文有批判错误路线毫不动摇。最近，公社把他派到一个基础较差的大队蹲点，他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到底！”王文有和其他同志进点后，首先办起了政治夜校，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林批孔，煞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王文有还满怀信心地表示：做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大学毕业生，就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为社会主义，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学、斗、干。

象王文有同志这样的先进人物，在朝农多得很。

农学系三年级学员杨秀敏，是一位敢于同损害集体利益的不良倾向作斗争的积极分子。去年夏天，个别私心严重的人拿了队里的尿素上了自留地，被杨秀敏发现后，那人为了堵杨秀敏的嘴，就拿一点给她，但她坚决给顶了回去。由于她爱管“闲事”，有人就说她是没“营生”了，也有人劝她“少得罪人”。但她坚定地回答：“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不良倾向，就是要管，对损害集体的人，就是要‘得罪’，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斗争哲学。”她决心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当一辈子新式农民，创一代新风。

牧医系三年级学员苏景华，今年二十一岁，共产党员。有人曾劝她别学兽医，说这不是姑娘家干的。但是，她坚定地回答说：“新中国的妇女能驾驶飞机上天，能开汽车，赶大车，怎么就不能当兽医呢？轻视女同志的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男尊女卑’的流毒。”她努力学习给牲畜治病和割猪等本领，三年中，为集体和贫下中农治好病猪二百多头，治疗大牲畜一百二十多头，割猪一百五十多头，大牲畜去势六头。当时，私兽医的活动严重损害了集体和贫下中农的利益，苏景华认为这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必须去占领这个阵地。她和同学们组织起来，为贫下中农割猪不要钱，还为社、队举办了两期赤脚兽医培训班，学员有一百多人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打击了私兽医的活动。

苏景华所在的大队自然条件较好，但产量一直上不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资本主义倾向较严重。为此，她主动要求毕业后回大队，挑起革命重担。她说：“麦苗不怕雪压，油菜不怕霜打，誓做学大寨的接班人，不把家乡面貌变，决不罢休！”在省、地、县委的支持下，最近，苏景华带领一个工作组回到家乡，同贫下中农一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抓革命，促生产，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

（本刊记者）

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辽宁省委联合召开 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辽宁省委联合召开了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和农林部门的负责同志，各高等农林院校和其他各类学校的代表，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和新闻单位的代表；还有辽宁省各类学校的代表和市、地文教、农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朝阳地区贫下中农代表、朝阳农学院毕业生代表和在校学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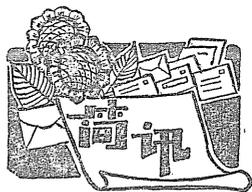
这次会议，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交流、学习朝阳农学院的经验，着重研究教育如何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的问题。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朝阳农学院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几年来，克服重重阻力，坚持在农村办学；到农村后，他们又遵照毛主席关于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导，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分散办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他们在农村，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适应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需要，实行“社来社去”，学生毕业当农民，挣工分，初步解决了一些农业院校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为教育革命迈大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个经验抓住了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具有战略意义。对整个教育革命也必将是一个大促进、大推动。

会议认为，要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就必须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刻苦学习、认真实践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因循守旧，彻底改革旧的学校体制和教学体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发挥党在学校的领导作用。

会议要求，不仅农林院校，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学习、研究朝阳农学院的基本经验。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落实措施，加快教育革命的步伐，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要学朝农，找差距，迈大步。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让朝农经验尽快地在本地区、本单位生根、开花、结果，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加强党的领导 迎接新的跃进

书记动手 全党抓教育革命

中共河北省邢台地委

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区各级党委领导成员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逐步形成了各级党委书记动手、全党抓教育工作的生动局面，推动了全区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目前，全区应该派驻工宣队的城镇学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对五千一百多个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普遍进行了整顿和充实，有一千八百个贫管会向学校派驻了代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通过批林批孔，办学方向更加明确，进一步落实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全区近六千所学校，全部实行了厂校、队校挂钩。校办厂（场）由四千四百多个恢复和发展到一万零五百多个。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革命师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蔚然成风，全区教育战线已组织起学习小组三万多个，参加学习的达五十多万人，在斗争中培养了五万多人的理论骨干队伍。

党委抓教育 首先要受教育

我们地委抓教育的自觉性，是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的。过去，我们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教育战线的现象。个别同志认为“文教部门抓文教，党委支持就行了。”也有的把教育与工农业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对教育革命主动抓得少，措施不够有力。党的十大以后，我们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几次组织大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地委派出三个工作组深入到十一个县调查研究，看到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一些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影响是严重的，在个别学校，资产阶级又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同时，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批象辛店大队贫管会那样的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好典型。这些先进单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决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经验，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能只抓产量上的千百万，必须抓好全区在校学生九十万。如果革命接班人培养不好，不仅千百万产量难实现，无产阶级江山还可能变！”大家一致认为，搞好教育革命，是阶级的委托，全党的事业，必须书记动手、全党来办。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地委把教育革命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去

年一至五月，地委六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教育战线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问题。地委“一班人”中，不仅主管文教的书记、常委抓教育革命，分管其他战线的书记、常委也把抓教育革命做为自已义不容辞的责任。地委开会，不仅教育会上讲教育，其它会议也讲教育。分管农业的书记，在全区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大讲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大议教育革命与农业学大寨的关系。地委专门召开过几次县（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会议，请辛店贫管会代表介绍了经验。还组织县（市）委书记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常委，到辛店学校参观学习。通过层层解决认识问题，全区各级党委抓教育革命的自觉性大大提高。

搞好教育革命 必须发挥工农兵主力军作用

我们还深深体会到：要搞好教育革命，必须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作用，单靠师生关起门来搞“革命”不行。因为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孔孟之道的流毒很深很广，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十分顽固。列宁指出：“在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教师，这就造成了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因此，教育革命，必须发动工农兵，使教育革命成为一场社会大革命。

为了充分发挥工农兵在教育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地委和各县（市）委、公社党委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不仅把学校师生动员起来，还要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发动大家都来参加教育革命。各级党组织，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不仅组织教育战线的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还认真组织其他战线的广大干部、党团员、民兵、妇女，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去年年初，地委和各县（市）委、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向广大师生和广大干部、群众传达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的严重教训，发动工农兵与师生一起揭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教育大家进一步认识教育战线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严重性，提高广大干部、工农群众和师生参加教育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临西县委第一书记吕玉兰同志，首先召开了有全县干部、师生和工农群众参加的广播大会，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接着利用典型经验，进一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大学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大议教育阵地上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表现，在全县很快掀起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群众运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区抽出一万多名路线斗争觉悟高、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作为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的辅导员，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二、不仅依靠工宣队、贫管会，还要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力量占领、改造教育阵地。目前，全区已有一千四百多个大队在生产队建立了贫管小组，对学生实行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管理和教育。工农兵讲师团进一步发展壮大，工农兵兼职教师由四千八百多名

增加到一万六千多名。他们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改造原有教师队伍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宮县苏村中学，在批林批孔运动初期，师生只是关在学校里批判“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师道尊严”，批来批去老是深入不下去。后来，在县委负责同志帮助下，这个学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与贫下中农一道批林批孔。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能光批分、分、分，不看学生在农村扎根不扎根；不能只讲开门不开门，不去看三大革命需要什么样的接班人。”贫下中农说出了他们的病根。于是全校师生走上社会，与贫下中农共同召开批判会、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按照广大贫下中农的意愿，根据农村三大革命的需要，进行了教学改革，为农村三大革命培养急需人材，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三、不仅搞好课堂内的教学改革和校办工厂（场），还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课堂，使教育与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批林批孔以来，我区城乡中小学校，普遍恢复、建立了校厂、校队挂钩制度。广大师生走进社会大课堂，与工农兵共同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进一步认清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太行中学党支部和驻校工宣队，带领师生走出校门，结合三大革命实践，请贫下中农当老师，作顾问，研究各科教改，收到了良好效果。我区一些农村中学，还实行了师生与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如农机手、农技员、饲养员、会计、赤脚医生等）建立师徒关系的方法，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日、假期跟班劳动，边干边学，包教包学，定期学会，进一步发挥了工农兵在教育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

认真转变作风 亲自抓好典型

运用典型指导运动，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导方法。遵照毛主席关于“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和“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地委六名书记、副书记和其他常委都把自己蹲的点也作为教育革命的试点。此外，还重点抓了五个教育革命的典型。对于辛店贫下中农管校这个先进典型，地委除派工作组帮助外，第一书记和主管文教的书记、常委还到那里与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一起座谈学习，并总结出了他们《顶得住，站得牢，管得好》的经验，在全区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全区教育战线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开展。我们在抓好辛店这个典型的同时，还抓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典型，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发现和培养典型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推广典型过程中，也充满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因此，必须狠抓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不断解决一些人的认识问题，这样先进单位的经验就会在全区范围内开花结果。

我们在批林批孔和抓教育革命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遵化县1976—1985年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草案）

河北省遵化县革委会文教局

我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是一个半山区。全县四十四四个公社（镇），六百九十二个生产大队，五十七万八千口人。几年来，全县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关于“穷棒子社”的光辉批示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促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七四年粮食亩产已达六百零一斤，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现在全县已有大中小型拖拉机七百八十多合，其它农业机械达六万多合（件），排灌、植物保护、脱粒、运输、米面加工、饲料粉碎等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每个大队都办起了小学，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每个公社（镇）都办起了初中，部分公社还办起了高中。中学由文化大革命前十七所（包括农中六所）发展到一百三十六所。中小学在校学生达十二万五千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工农业业余教育也很有生气地开展起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联系教育战线的实际，清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影响，使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县教育战线的一系列变革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全县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还仅仅是开始，对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很不适应。县委初步考虑，一九七五年粮食亩产要过“长江”，一九七七年要实现农业机械化。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贫下中农提高文化水平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工厂、农村都需要大量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材，各方面都不断向教育战线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使我县教育事业适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三大革命运动培养人材，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我们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确定全县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继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巩固、发展普及小学教育的成果，积极改造现有中、小学教育，逐步普及中学四年教育。办好“五·七”大学，发展幼儿教育，搞好工农业业余教育。从小学到“五·七”大学，从学龄前的幼儿教育到“五·七”工农业业余教育，受教育面要达到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逐步建立起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而努力奋斗。

一、进一步贯彻执行“教育要革命”的指导思想

为使全县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必须以毛主席提出的“教育要革命”的思想为指针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发展教育事业。

(一)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不懈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清除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教育战线的影 响，使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二)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三) 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四) 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农村，把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培养又红又专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一代新人。

(五) 发扬“穷棒子”精神，勤俭办教育。

二、积极办好“五·七”大学

由县委统一领导，发挥各部门办学的积极性，发扬“抗大”精神，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创办一所“五·七”大学。

“五·七”大学为本县培养农村迫切需要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服务。

“五·七”大学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县、社、队三级农机修造网的工人中选拔学员。学员社来社去，队来队去，厂来厂去。

“五·七”大学设置政治、文艺、体育、农业技术、林果技术、农业机械、水利、农电、财会、农机制造、医药卫生、畜牧兽医、师范等专业。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学制根据专业的需要而定，一般一至二年左右。并根据农业发展的急需积极举办短训班。每年为工农业等各条战线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材一千余人。计划一九八〇年前培训七千零五十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间培训六千五百人。

“五·七”大学根据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在一九八〇年前，逐步建立社队网点，以适应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为普及工农业科学技术创造条件。

三、努力改革并逐步普及中学教育

我县已有初中一百一十一所，高中二十五所。初中教育已普及百分之八十五，高中教育已普及百分之三十五。初、高中在校生达二万六千余人。

按照毛主席“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的教导，各类中学都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加强

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观点出发，抓好学校各方面的工作。

各中学都要坚持面向农村，为三大革命服务的办学方向。课程要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删繁就简，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改革教学内容。要增加农业生产、农业机械等专业技术课。要改变过去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毕业后从事工农业生产还得从头学起的现象。

根据全县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学学制仍坚持初中二年、高中二年的四年制。根据革命和生产的需要，中学也要办一些短训班或专业班，承担为本地区、本社、本队培养各方面所需要人材的任务。

要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在五年内各中学都要办好工厂、农场、饲养场，并巩固发展校队挂钩，作为师生的教学基地。

一九八〇年前，全县要普及初中教育，在校生达三万九千人，高中教育要逐步普及到百分之七十，在校生达二万五千六百人。一九八五年前逐步普及高中教育。

在发展中学教育上，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充分发挥国家与集体办学的两个积极性。根据国家提供的人力物力，要尽量多办一些学校，多招一些学生，到一九八〇年，十四所公办中学要增加高中班八十五个，初中班二十九个；发展厂矿企业办学初中班十五个，高中班十五个；现有社办公助高中要逐渐多招五十个班；现有初中要逐渐多招学生二百一十五个班；并根据毛主席关于“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的指示，要逐步发展社办公助高中一百四十个班；在一百七十三三个较大村镇中发展队办公助、校队合一高中七十五个班，初中一百五十个班；发展半耕（工）半读初中二十个班，高中二十六个班。各种学校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走自力更生，勤工俭学，勤俭办学的道路。

四、巩固、发展普及小学教育的成果

全县小学五年教育已普及百分之九十八，在校学生达九万九千多人。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抓好巩固和提高工作。巩固、发展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这一新生事物。继续办好方便贫下中农子女学习的半日制、巡回班、包教等多种形式学校，使凡有学习能力的学龄儿童都受到小学五年教育。

小学要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要使少年儿童从小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敢于批孔老二。要开门办学，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创造条件，办好“小三厂（场）”，搞好校队挂钩，从小培养少年儿童的劳动习惯，学到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知识。

五、发展幼儿教育

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妇女劳动力，使幼儿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打下基础，要逐步发展幼儿教育。计划一九七七年办起幼儿班二百个，一九八〇年前要办起幼儿班四百个，一九八五年前，普及幼儿教育。

六、搞好“五·七”工农业余教育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工农群众迫切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技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要继续办好“五·七”工农业余教育，组织广大工人和社员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培养一支工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扫除青壮年文盲四万二千人，半文盲三万五千人。一九八〇年前，要在工厂、农村逐步办起工农业余中等专业学校或专业班，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促进“劳动人民要知识化”。

在下乡知识青年集中的村队或专业队，要办起下乡知识青年政治、技术业余学校。知识青年较少的社队，公社要办定期学习的政治、技术业余学校，县办“五·七”大学要附设函授学校，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函授学习，关心知识青年的政治文化生活。

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县现有教师四千六百余人，其中公办教师一千六百余人，民办教师三千余人。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到一九八〇年，需增加中学教师一千八百余人，幼儿班教师四百余人，但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所需小学教师逐渐减少。这部分教师补充到中学和幼儿教育中去后，教师队伍实际需增加一千四百余人。解决的办法是：除高等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每年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外，计划五年内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教师三百余名；“五·七”大学师范专业五年内培训师资七百九十余名。同时，要发展壮大工农兵兼职教师队伍。

要组织教师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鼓励教师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改造锻炼自己。对现有中学教师，要由县和各校分别做好安排，分期分批下厂下乡，每期三个月至半年，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增长革命才干。担任技术课的教师，通过下厂下乡的锻炼，要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小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假日参加社队劳动，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为三大革命服务的本领。

“五·七”大学师范专业要逐年对文化业务水平较低的教师进行轮训。要办好教师进修、教学研究站。鼓励教师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研究文化业务技术，努力做到又红又专，一专多能。

八、发扬“穷棒子”精神，勤俭办教育

要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教育。要搞好校办“三厂(场)”，勤工俭学，巩固、发展学工学农基地。在一九八五年内，全县所有学校除公办教职员工的工资外，办学经费要逐步实现自给或半自给。

根据教育事业的发展，全县一九八〇年前中学需逐渐增加校舍三千四百间，教学班八百二十个，教师一千四百人，共需资金四百三十万元。在国家教育经费逐年有所增加和不再加重集体和群众负担的情况下，我们的办法是：

(一) 通过勤工俭学积累资金。各中小学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勤工俭学，把校办工

厂与县五小工业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工、学农中既经受锻炼，又创造物质财富。勤工俭学收入要由现在每年四十万元逐年增加五万元，到一九八〇年全年收入要达到七十万元。这样从一九七五至一九八〇年总收入可达三百四十多万元。其中百分之四十用于学生学习费用和福利事业；百分之十作为积累，扩大再生产；百分之二十用于学校的经费开支，百分之三十用于学校的基本建设。

(二) 进一步发挥群众集体办学和厂矿企业办学的积极性。

(三) 老学校要做新贡献。现有十四所规模较大的公办中学，在一九八〇年前，除公办教师工资外，要逐步实现自给有余，对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 校队合一、社办厂(场)校合一、半耕(工)半读的学校，要努力做到自己解决教育经费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县办“五·七”大学除建校前三年由县和有关部门投资外，一九八〇年前，要逐步达到办学经费自给。

(五) 因陋就简，修旧利废，充分挖掘潜力。在校舍和教学设备暂时满足不了的情况下，采取腾公房，修旧房，建简易房，扩大班容量等方法，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因陋就简，土法上马。

九、加强党的领导，搞好组织建设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县镇中学和“五·七”大学要加强工宣队的力量，农村中小学要进一步健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要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在“五·七”大学和各中小学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民兵等组织建设，培养教育革命的骨干力量。“五·七”大学和较大的中学要建立起党委或党支部，团委或团支部，规模较小的中学和较大的小学要建立党小组或团小组。

学校领导班子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注意培养选拔新生力量。

十、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检查、落实教育发展规划。各公社和各个学校都应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自己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要在每年年终召开有工宣队、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和学校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上检查落实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修订完善规划内容，保证规划实现。

为革命大造“争气灯”

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

最近，我们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全体同志，学习了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受到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大家表示，在当前工农战线跃进的新形势下，我们作为文教战线的一部分，要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我们一定要搞好教育革命，造出更多更好的争气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实验室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实行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担负了教学、科研、生产三方面任务的实验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怀着为社会主义争光的雄心壮志，急人民之所急，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在短短几年内，试制成功了二十多种国家急需的新型电光源。现在，这些成果不少已被应用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许多部门。

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斗争得来的。我们跟帝、修、反斗，跟修正主义路线斗，跟懒汉懦夫世界观斗，跟工作中的困难斗，每一次斗争胜利，都使我们的工作前进一步。可是，有的人对于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我国自己的电光源事业的雄心壮志，看不上眼，他们说：“电光源——小鞭炮！”还说什么：“电光源是搞应用，没有理论。”

电光源是“小鞭炮”吗？我们说：一盏灯，比起高楼大厦、万吨巨轮来，自然要小得多了，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机器上，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某些新型电光源，当我们暂时还不能生产的时候，帝、修、反总是千方百计卡我们，妄图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你想进口吗，他宣布涨价，或者干脆不卖。有时候，我们进口一台贵重仪器，用不上几个小时灯泡就坏了，你想再买几个灯泡吗，他就说：“买一只灯泡就得搭买一台仪器。”他们搞了那么一点新光源，便以为奇货可居。我们深切地感到，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定要把争气灯造出来，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有的人不相信我们工人能够搞科研，他们摆出一副“权威”派头说：“在复旦谁有资格搞电光源？！”什么“资格”不“资格”，这是孔老二、林彪鼓吹的“上智下愚”的翻版。我们批判了这套谬论，大家说：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有实践经验，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人，论“资格”，我们是最有资格搞科研的。在新型电光源领域，我们有志气、有能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与有关工厂协作，研制成功了一种又一种新光源。现在，这些灯不但在广大城乡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开始出口，不少国家向我们订购。这是我们对帝、修、反的有力回击！

有的人说我们：“电光源搞的是应用，没有理论。”在这些人看来，搞应用科学是低级的，是“小儿科”，只有搞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才进得了科学的“殿堂”。我们的看法和这些人完全相反。我们认为：搞应用，好得很！把发明创造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这是人民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科研为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特别是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坚持科研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使新光源的研制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九七二年夏天，上海的钢铁工人大打钢铁工业翻身仗，钢铁厂里日夜沸腾，一片战斗景象，可是在包渣场上，遇到了一个难题：钢渣出来以后，要在这里打碎、冷却，起重的行车开来开去，电压忽高忽低，原来用的场地照明灯经常熄灭；在打碎钢渣的时候，有剧烈震动，又常常把灯泡震坏；因为灯泡功率大，温度高，大雨一来，又常常使露天的灯泡炸掉，不但经济上浪费大，操作不安全，而且影响了生产。蔡祖泉同志和实验室里的工人、教师急钢铁工人所急，多次到钢铁厂调查，听取意见，决心研制新光源，支援钢铁工业。同志们说：“钢铁工业战高温、夺高产，我们也要战高温、造新灯！”大家齐心协力，冒着盛夏酷暑，奋战几昼夜，试制出了一种新型电光源——钠铊铟灯。经过多次改进，现在这种灯能够防风、防雨、防震、耐高温，能适应电压波动，亮度也大大提高，还节约用电百分之六十以上，受到钢铁工人的欢迎。

对印刷工业打翻身仗，我们也积极配合。我国的印刷工业在照相制版技术方面，长期以来，用着笨重的炭精灯，不但操作不便，而且会产生毒气，妨碍工人健康，腐蚀照相机的镜头，影响印刷质量，风一吹，电弧就飘动，所以即使在大热天，车间的门窗也要关得严严的，不能通风。广大印刷工人迫切要求用新光源代替笨重的炭精灯。我们实验室的同志把研制照相制版新光源、支援印刷工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大家说：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印刷术，我们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也一定能够赶超世界印刷工业的先进水平！一九七三年，我们根据印刷厂工人们的要求，试制出了一种照相制版用的镉灯，它体积小、亮度高、分色能力强，用它印出来的照片很逼真，有立体感，同时，还没有污染，不怕风，可以开窗操作，车间里空气清洁多了。

发展我国的电影工业，拍摄更多更好的革命影片，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我们决心为发展电影工业贡献力量。我们与有关工厂协作组成了电影光源会战组，克服了人手少、设备不足、材料缺乏的困难，在较短的时间里试制成功了几种拍摄电影和放映电影用的新光源。过去拍摄电影外景用的照明灯，一只就有一百八十公斤，现在一盏灯只有二十多公斤，达到了小、亮、轻的要求。去年上半年，我们与有关工厂一起研制的水冷氙灯，用来放映彩色影片，色彩鲜艳、明亮，操作方便，大大减轻了放映员的劳动强度，现在已在上海一些电影院推广使用。我们与有关工厂研制成的铟灯，不仅可以放映电影，还可以装在显微投影器上，把显微镜下切片的图像放大到银幕上，用来诊断肿瘤和进行医学教学。

总之，我们坚持科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只要是革命的需要、

人民的需要，我们就坚决干！我们搞的科研项目，都是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研制新型矿灯，由于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干扰而没有承担这一任务。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以来，我们深入煤矿，深入矿井进行调查。矿灯是矿工的“眼睛”，现在用的矿灯又暗又重，影响了开掘进度。我们根据煤矿工人的需要，配合有关灯泡厂和科研单位，立即动手，研制了一种又小又亮的新型矿灯，受到煤矿工人的欢迎。

我们重视应用、重视实践，并不是不要理论。对于什么是理论，不同世界观的人也有不同的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我们的实践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们的理论，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有了经验就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理论。难道只有从洋本本抄来的才算理论吗？我们不信那一套。那些讥笑我们没有“理论”的人，他们能拿点理论出来给我们看看吗？他们拿不出来！他们不会造灯，没有实践，要拿就是洋本本。过去，我国没有一本自己的电光源方面的专业书。现在，我们不但造出了灯，而且在总结我们自己和我们许多灯泡厂工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了《光源原理与设计》、《阴极电子学》、《电光源制造工艺》、《光源测量》等新教材，初步满足了电光源专业教学的需要。近几年来，我们还写了十几篇专业论文，分别发表在多种理论技术刊物上，从理论上总结了我们在研制新光源方面的实践经验，受到灯泡厂工人、技术人员的欢迎和学术界的重视。

我们实验室是学校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不但要出产品，而且要出人材。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向自己提出了创办电光源专业的任务。有的同志说：我们实验室人手少，任务重，现在工作已经很紧张，再招生、办专业，就会“科研上不去，教学搞不好。”我们承担的任务确实已经很重，人手少也是事实，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这副担子我们一定要挑起来！有困难吗？只要我们把路线搞对头，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全面完成教学、科研、生产任务。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激发了革命热情，教育革命也就促上去了。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我们办起了电光源专业，现在，已经招收了两届学生。除了办普通班之外，我们又办起了短训班。一年多来，我们协助有关部门举办了五期印刷、电影新光源短训班，培训了三百四十多名技术骨干。在我们实验室里，工人是教师，教师也是工人。工人参加编写教材，登台讲课，教师也下车间劳动，拿榔头，吹玻璃，一人承担几项任务。连刚进厂几个月的青年工人也在教学中发挥了作用，工农兵学员也在短训班上担任教学、辅导任务。在我们实验室里，一支又红又专的电光源技术队伍正在迅速成长。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虽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最近，我们以“风庆”轮等先进单位为榜样，发动群众，学先进，找差距，鼓干劲，订规划，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教学、促科研的高潮。我们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在研制新型光源方面更加努力奋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做出新贡献。

工科院校要大力支援农业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编者按：工科院校为大办农业服务是否大有可为？这个材料作了很好的回答。

我们搞教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牢固地树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好了，农业发展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加巩固。在学习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时，希望各级各类学校都要认真考虑如何支援农业的问题。要提高认识，制定措施，作出切实的努力。

遵照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教导，几年来，我校在教学、科学研究和校内生产等方面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安排和落实了有关农业四化的项目四十余项，并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来抓，既为发展农业贡献了力量，又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我们的做法是：

(一) 在开门办学中，选择有关农业四化的项目，作为教学的典型任务。据统计，目前下厂的专业中，已有半数专业选择了与农业四化有关的课题作为典型教学任务。例如，机械制造专业的师生，前阶段为西安柴油机厂设计了十一台柴油机生产用的专用机床，最近又参加西安柴油机厂技术改造的会战。焊接专业一年级学员，入学不久就参加西安农机厂去年第四季度制造八百辆拖拉机拖车的战斗，受到有关单位的好评。

(二) 选择支农工厂，长期挂钩，积极参加技术革新。西安市东风车辆厂是一个生产架子车的工厂，年产三十万辆。为了支持这个厂产量翻番，并逐步达到年产一百万辆的能力，我校锻压、焊接、金相和工业企业电气化四个专业的师生结合该厂技术改造中的关键项目进行教学，先后完成了“龙门刨可控硅调速系统”、“630吨冷锻机设计和机架焊接”等课题。目前，这个厂已成为我校几个专业共同的长期挂钩厂。流体力学教研室，利用原有实验室的设备，在省机械局的支持下，建立了水泵试验站，为我省各地生产水泵的农机厂进行产品检定和性能改进。他们还走出校门，与全省七十多个农机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三) 密切结合农业四化的需要，多种形式开门办学。例如内燃机教研室，去年先后在高陵、渭南和镇安举办了三期拖拉机手短训班，参加学员约一百人。流体力学教研室举办的水泵技术函授班，定期集中辅导，时间短，收效快。此外，我校的五·七干校也在高陵举办

了农村电工短训班。

(四) 把有关农业四化的科学研究项目放在重要位置。我校与宝鸡永红机械厂协作设计和研制的氮氢压缩机,已经装备了我省十三个化肥厂。在我省三百立方米制氧机成套设备的会战中,我校完成了其中压缩机、制冷机的设计和分馏塔的制造任务。目前,这套设备已经顺利投产。流体力学实验室工人与西安郊区新筑农具厂协作,试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空气密封式水泵”,结构简单,运行维修方便,很受贫下中农的欢迎。一些比较重大的支农科研项目也大大加快了研制的步伐。

(五) 发挥校办工厂和实验室的作用,密切结合教学,积极生产和修理农机产品,推广新技术。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二年,我校在全省水泵会战中陆续生产450型、319型水泵共二千七百台。我校机电厂生产四千瓦农用电机一千五百多台。电机专业结合教学成立了修理部,几年来为生产队修理电机一千六百五十多台。并为农村培养了电机修理工五十人。工物系与省蚕桑研究所协作,利用实验室的放射源,照射蚕种,使柞蚕成活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

回顾几年来我校为农业四化服务的工作,我们深刻体会到: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力量在群众。毛主席对延安人民的复电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指示,鼓舞着我校师生员工为改变陕西农业的面貌而贡献力量。同志们说:“交大迁校已经十八年,吃在陕西,住在陕西,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学校严重脱离陕西地区工农业生产实际,这种情况必须彻底改变。”正是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端正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才有可能使我校在支援农业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当前我省工农业战线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局面,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即将到来。我校正在进行全面规划,决心为全省农业上“纲要”和实现机械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的初步想法是:

(一) 进一步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推动教育革命,推动支农工作。要把农业四化工作列入重要日程,作到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要学习、宣传、落实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一系列教导,进一步提高支援农业的自觉性,要大造支农重要、支农光荣、支农大有可为的革命舆论,使支农成为全校人人关心的大事。

(二) 今年我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行毕业实践,一、二年级学员将大批下厂开门办学。在安排中要把农业四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切实作好安排。

(三) 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各专业间的大协作,在今年上半年的开门办学过程中抓好几个在支农方面有较大意义的课题:(1)金属材料强度科研成果在本省支农工业中的推广应用,提高农业机械零部件的质量和寿命;(2)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成套设备研制中,我校承担的八个科研课题;(3)东风车辆厂机械生产的自动化;(4)空气密封式水泵的研制;(5)4105柴油机(用于铁牛55型拖拉机)缸体生产线的设计。

(四) 充分挖掘潜力,鼓足革命干劲,办好支农的各种类型短训班。如农用柴油机维修、有线广播、农业用电、水泵技术等。同时,积极准备为农村知识青年办好函授和广播教育。

(五) 积极支援中学教育革命,配合中学专业班的开设,协助培养现有师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通俗讲座

北京大学 哲 军

(一)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目前，一场新的经济危机的风暴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猛烈地冲击着资产阶级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陷入了不可解脱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面对这种险恶局势，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惶惶不可终日，处心积虑地寻找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其实，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尽管他们编造出种种谎言，开列出剂剂药方，也救不了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制度，挽回不了他们走向彻底灭亡的命运。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简单地说，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资本家的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如今年七月份，美国洛杉矶经营牛奶的垄断资本家因为牛奶卖不掉，把三万八千多加仑的优质牛奶倒在臭水沟里。这就是经济危机的表现。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种危机称为“在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

资本主义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是生产的东西太多了，超过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而卖不出去呢？不是。在叙述美国煤矿工人生活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这一点作了生动的描写：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问母亲：“现在天气这么冷，您为什么不生火炉呢？”母亲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儿子又问：“爸爸为什么失业呢？”母亲说：“因为现在煤太多了。”煤矿工人因为挖的煤太多了而没有煤烧！象这样的咄咄怪事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高楼大厦林立，许多住宅无人居住，另一方面

很多工人挤住在破烂肮脏、病疫丛生、甚至连阳光空气都不足的贫民窟里。还有不少人因交不起房租，只好露宿街头，或在桥洞、破车厢里暂避风雨。据报道，美国一九五九年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数达2200万，住在劣等住宅中的人数达4000万。一方面，资本家把牛奶倒进臭水沟，把粮食布匹放火烧掉；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却缺吃少穿，忍饥挨冻，挣扎在死亡线上。如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仅一九三三年一年，美国资本家就把1040万英亩的棉花毁在地里，把640万头猪抛入大河，把大量的小麦投入机车锅炉烧毁。巴西资本家也把2200万袋咖啡扔入海中，而在一九三四年一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就饿死240万人。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生产过剩，是和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和人民群众低下的购买力相对而言的过剩，是“相对”的过剩，不是绝对的过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东西太多、人民用不完。

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荒唐现象的根源在那里呢？从根本上说，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

为了弄清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我们必须首先搞清什么是生产的社会化。让我们来看纺织生产吧。纺纱机、织布机等是供许多人共同操作的，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纺纱工人把棉花纺成纱，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印染工人把布漂洗印染，最后经过检查出厂，成为商品，它们之间是相互依赖、密切联系的，这就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出厂的商品是纺纱、织布、印染、检查等工人共同劳动的产物，这就是产品的社会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个企业通过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经济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这种社会化的生产要求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样，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就发生了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这种基本矛盾，首先表现在资本主义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其次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的这些矛盾是怎样引起经济危机的呢？让我们看汽车生产部门的生产情况吧。在资本家的汽车制造厂里，工人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厂房、机器、产品都是属于资本家私人的，资本家对工厂的生产有绝对的支配权。生产什么样的汽车，生产多少，如何生产，都是由资本家的“小算盘”决定的。资本家为了生产更多的汽车，获得更大的利润，即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不断调整劳动组织，加强管理监督。这说明每个工厂里是相当有组织的。但是整个社会生产却不能统一安排，处于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汽车生产部门的各资本家不了解其他工厂的生产情况，也不知道社会的需要，只要看到汽车价格高，有利可图，就拚命盲目扩大生产；社会上其他资本家，看到汽车价格高，可以赚大钱，也在汽车制造业增加投资，于是汽车制造业内各个资本家之间，为了争夺利润，就展开了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其他各生产部门也是处于这种无政府状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机器制造工业和采矿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的现象，由于竞争和

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的作用，会日益严重。这种“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一个方面。既然社会化的生产，把各个企业各个部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这就要求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等方面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虽然社会化了，生产资料和产品仍然是资本家私人占有，整个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能是无政府的状态。

现在再让我们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的另一个方面。资本家都是狼心狗肺唯利是图的吸血鬼，他们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就利用各种方法压低工人的工资、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使劳动人民越来越贫困。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榨来的血汗，再用来扩大生产，采用新技术，改进机器设备，结果使大量工人失业。美国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份失业人数已达到600万，在芝加哥有四分之三的建筑工人失业。失业工人陷入极端穷困的境地。失业人口大量存在，又使在业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化，这样进一步加深了整个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美国现在除农业人口外，生活在政府承认的“贫困线”以下和边缘的约有5000万人。这就使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限制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但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增强竞争能力，就拼命扩大生产，改进生产技术，而机器大工业具有“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于是就出现了生产猛烈扩张，商品堆积如山，而广大劳动人民却因贫困无力购买的矛盾现象。这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个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发展的。当这些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时候，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可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有规律地周期地爆发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侣。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一次。从一次危机的爆发到下次危机的爆发之间这段时期，叫作危机的一个周期。一般情况下，周期是由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组成的。

危机是整个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在危机阶段，大量商品找不到销路，存货堆满仓库。这就迫使资本家缩小生产规模，从而引起生产的急剧下降。这时，资本家在市场上的竞争空前加剧，以致竞争能力比较薄弱的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因经不起危机的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同时，许多企业因销售困难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而银行又急剧缩减贷款，这又引起货币危机。银行大批倒闭，股票行市猛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一方面大量销毁商品，一方面毁坏生产能力，缩小生产规模，大量解雇工人，于是又造成千百万工人的失业和半失业。在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因工资大幅度降低等原因而急剧恶化。总之，经济危机象一个恶魔突然降临一样，使资本主义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与混乱之中。

危机持续一段时期以后，就进入萧条阶段。这时生产已不再继续下降了，但仍处于停滞状态，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资本家为了摆脱这种半死不活的困境，一方面用提高劳动强度、降低工资等手段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用更新机器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机器设备等固定资本的更新，首先推动了生产资料部门如机器制造业的生产，接着带动了生活资料部门如纺织业的生产。这样，整个社会生产就逐渐提高，萧条转入复苏阶段。

在复苏阶段，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到危机以前的水平，当生产超过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时，复苏阶段就进入了高涨阶段。

在高涨阶段，生产不断扩大，商品价格很高，资本家认为这是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机会，于是新企业不断兴建起来，旧企业也迅速扩大生产。商人因估计到市场会继续扩大，因而抢购商品。银行资本家也认为工商业前途很有希望，愿意贷款给工业资本家和商人。这样一来，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又忘乎所以，不顾一切地盲目扩大生产。产品越来越多，市场上出现了一派虚假的繁荣景象。但“好景”不长，到了市场的商品远远超过社会购买力、再生产的比例遭受严重破坏的时候，生产过剩的危机又会象风暴一样袭来，整个社会又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有规律地周期地爆发呢？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强制地使社会再生产的各种比例达到暂时的平衡。危机过去了，资本主义生产暂时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经过一段时间，又会爆发新的经济危机。这样恶性的往复循环，愈来愈严重，直至资本主义的灭亡。

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就捏造了种种谬论，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们还开出了许多“处方”，妄图治好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治之症。

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危机仅仅是群众消费不足的结果。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群众消费不足”的现象，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产生了，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用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群众消费不足”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显然是荒谬的。

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认为危机是各个生产部门的比例偶然破坏的结果，并认为垄断组织“将能够组织生产和消除危机。”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历史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论断。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组织不仅没有消除危机，相反使危机更加频繁，更趋严重。

还有些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认为危机是由于“投资不足”引起的，并提出用财政赤字、

通货膨胀增加政府投资，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等办法来消除危机。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就是根据这套“理论”采取反危机措施的。其结果，不但危机没有消除，反而使生产过剩、通货膨胀和金融货币危机等多种病同时并发，使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顾此失彼，惊恐万状，至今还没有找到出路。铁的事实宣告了这套辩护性“理论”的彻底破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在于已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二）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经济危机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规律地、周期性地发生。各个时期的危机又各有其历史特点。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自由竞争过渡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寄生、垂死性日甚一日，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愈加频繁、扩大和严重。每次危机的爆发，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激化起来。其中以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危机最为严重。以至驱使帝国主义从战争中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危机和战争带来的沉重灾难面前，也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和反动本性，日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二次大战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一般情况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相联系的。

一八二五年英国首次爆发了经济危机，拉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的第一幕。因为当时只有英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基本完成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机器大工业在生产中占了绝对优势。因此，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加剧，终于在一八二五年导致了全国性的危机。从此以后，经济危机就跟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全过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大工业相继在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机器大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向全世界的扩张，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加强了。经济危机日益具有世界规模。一八五七年发生于美国，随即蔓延到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各国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史中第一次具有明显的世界性的特点。此后在一八六六年、一八七三年、一八八二年、一八九〇年资本主义世界又先后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一八七三年的危机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破坏性较大。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次危机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夺取市场的斗争愈益激烈，随着这种斗争而来的是生产的高度集中，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一类垄断组织得到了初步的广泛发展。

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后，又在一九〇〇年、一九

〇七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七年连续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总之，二次大战前危机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危机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具有世界性。危机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跳跃式地发展，即进两步退一步，有时甚至两步都退回来。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呈现出上升与下降，增长与倒退的交替状态。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危机的特点是周期较长，一般大约十年左右爆发一次，危机阶段较短，资本家还较容易摆脱，因为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阶段。当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以后，由于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危机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过去的时代。周期也缩减为七年左右一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危机的困境之中。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危机的破坏性是空前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提起这场“雪崩式”的大危机，还常常谈虎色变，惶恐不安。这次大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倒退了几十年，同时也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

这次大危机的爆发决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总危机阶段。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的迅猛发展，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加剧，使资本主义过分膨胀了的经济力量与日趋缩小的国内国际市场的矛盾越发尖锐。这些是爆发三十年代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兴起，更加加深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危机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除英国外，都超过了战前水平，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战争横财的美国，经济力量膨胀更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到一九二九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便超过了战前水平的80%，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的48%，相当于欧洲的总和。这种盲目扩张的工业生产，很快超出了劳动人民的实际支付能力。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危机便于一九二九年十月，首先在美国开始了。然后扩及全欧洲，终至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这次大危机，主要表现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美国和德国跌得最惨。分别下跌46.2%和40.6%，法国下跌32.9%，英国生产停滞多年，又下跌了23.8%。生产下降以重工业部门最为严重。倒退到二十世纪初甚至十九世纪末的水平。如美国的钢、生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倒退三十一年，三十六年，二十八年。英国上述部门分别倒退二十三年，七十一年，三十五年。德国分别倒退三十五年，四十六年，三十三年。在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产量下降44%，大约后退到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的水平。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分别后退了三十——四十年。世界贸易总额下降66%。以上这些状况是以往任何一次危机都没有过的。

这次危机所以延续四年多的时间，还由于工业危机与农业危机相互错综的缘故。农产品

大量过剩。一方面千百万劳动人民挨冻受饿，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大批农产品腐烂、放火烧毁或抛入大海的荒唐现象。仅在一九三三年一年内，美国就毁掉棉花一千多万英亩，小麦七百五十五万英亩，牛羊二千三百万头，猪六百万头。农产品价格也急剧下跌。在世界市场上，小麦批发价跌落70%，大豆、棉花、咖啡等跌价70%以上。

在这次危机中，工业危机使得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慢性农业危机变得更为尖锐，而农业危机又反过来更使工业危机火上加油。在工农业危机交织并发、相互激荡的同时，还爆发了金融货币危机。大批银行纷纷倒闭。仅美国一国在危机期间就倒闭银行六千多家。

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美国毁坏了九十二座高炉，英国毁坏了七十二座，德国毁坏了二十八座，法国毁坏了十座。一九二九年危机的破坏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程度。

危机给各国劳动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灾难。据一九三三年三十二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统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者高达三千万人。美国危机最严重时失业者达一千五百万人，占在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德国失业人数最高时达到六百——八百万人，将近占全国工人的半数，在欧洲各国中失业率最高。危机使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各国的罢工运动，示威游行以及农民斗争此伏彼起。仅美、英、法三国在危机期间就有五百多万工人罢工。

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和黑暗。经济上的恶化导致了政治上的更加反动。为了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一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建立了最反动的法西斯专政，疯狂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走上了战争道路。

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争夺国际市场的斗争更加突出。在危机中，帝国主义各国利用了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进行激烈的争夺，关税战、货币战、商品倾销战愈演愈烈。当时英国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在一九三三年将输入商品一律课以10——33.3%的从价税，并把英镑贬值以刺激商品出口。德国加紧打入拉丁美洲，排挤美英势力，扩大资本输出。但是，由于这次危机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相互转嫁危机的困难。要摆脱危机靠一般的手段已经不够用了，帝国主义各国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了帝国主义的日程上来。

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是以各自的实力为依据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不平衡是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当帝国主义各国的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以后，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日两国在美国的扶植下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危机对帝国主义各国的打击不同，进一步改变了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意大利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分赃过少，德国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是损失了赃物的国家，因而全副武装地跑上了战争舞台，企图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挽救自己的死亡。

三十年代初期，德、意、日等国为发动侵略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首先，在国内强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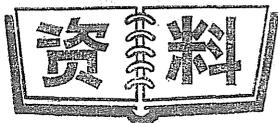
家机器，疯狂镇压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行最反动、最黑暗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把建立法西斯专政作为巩固将来战线后方的必要手段。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立即实行公开的法西斯统治。日本也在政治上逐步废除了政党内阁制，建立由军队、官僚和财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政权。与此同时，德、意、日等国又把经济转到战时经济轨道，加紧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增加军费开支，扩大军工生产。德国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的六年多时间里，军工生产扩大了十一倍还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日本军费开支也增加了一倍多，大多数企业与军工生产发生联系。法西斯的反动统治，大量军火的生产，把德、意、日等国拖上了战争的道路。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一九三五年德国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帝国主义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意、日等国在加紧阴谋策划和继续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同时，却高唱“永久和平”的无耻澜言，麻痹各国人民，欺骗世界舆论，掩盖自己的掠夺本质。德国在挑起全面的世界大战以前，与未来的交战国波兰、英国、法国等国先后签定了不少的所谓条约和协定。英、法帝国主义为了把德国这股祸水东引，对德国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只是在德国发动了对英、法的侵略战争以后，才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危机过后，美、英、法等国家刚刚从危机中爬出来，又跌进了一九三七年的经济危机之中。德、日、意的一时崛起和接连的对外侵略战争造成了对美、英、法等国的严重威胁，成为他们争霸世界的严重障碍。美、英、法为了摆脱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危机，摧毁对方的霸权，也逐步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企图在发动对外战争中寻找出路。因此，帝国主义各国按着各自的利益分别组成了德、意、日与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使战火不断蔓延，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关系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一次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建立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给帝国主义带来光明，相反，它却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被人民送上了断头台，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受到了战争的削弱，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锻炼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

当前，苏美两霸在加紧军备竞赛的同时，却大唱什么“一代人的和平”、“持久和平”的高调，这完全是当年法西斯希特勒的故伎重演。在他们散布的“和平”烟幕弹的背后是侵略、扩张和争夺霸权。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防止苏美两霸狗急跳墙，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研究李贽问题的新史料

——《清源林李宗谱》(部分)简介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和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的大好形势下，最近，我们依靠群众，在泉州发现李贽家族清乾隆间抄本《清源林李宗谱》卷之三《历年表》（以下简称《历年表》）一本，清《光绪间宗谱抄录》残页十页，清康熙二十一年李贽故居地契一纸；根据《历年表》记载的线索，在晋江发现了李贽之妻墓，和李贽为其妻所写的墓碑残石。此后，又在南安发现了一批李贽家族的墓志铭石刻。这些重要文物的发现，对于研究李贽很有参考价值：有些可以补充或纠正过去已经知道但不全面或者竟是错误的材料；有些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新材料。现将《清源林李宗谱》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

一、换姓改名的政治原因

李贽本不姓李，而是姓林；他本名也不叫贽，而叫载贽。过去发现的《凤池林李宗谱》和最近发现的《光绪间宗谱抄录》（残页）都只是说“始祖讳闾，字君龢，号睦斋公。……妣钱氏”。因为这些宗谱在写李贽的始祖时，都没有写明姓氏，所以一般人便因李贽姓李而推想其始祖当然也姓李，结果就造成了错误。

关于李贽的先世改姓，《凤池林李宗谱》也有交代，不过它说改姓的原因是因为家族内部兄弟间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这很欠说服力。宗教信仰的不同，何致于闹到改姓的地步呢？

《历年表》的发现，解了这个谜。第七页永乐壬寅条说：李贽的老二房三世叔祖林广齐“以资显，又性刚，罹祸三山”。“先是徐察院子侄骑马过岳，叔祖掀下之，徐憾焉。伺叔祖到郡城（泉州），拿置幽室。迨各佃抢回，徐竟以不轨罗织大狱，叔祖遭重辟，子遁斋遣戍”。“老长房三世祖叔允诚公从广齐移居南安胭脂巷，改姓李”。这段记载说明了李贽先世改姓的真实原因。林广齐因得罪姓徐的封建大官僚，被迫改姓并且逃到南安；林允诚可能怕被迫害也和林广齐一起迁到南安，而且也改姓李。但是封建统治阶级还是没有放过他们。结果林广齐终于在十几年以后被抓到福州杀头，儿子充军，家破人亡。根据南安出土的《李章田墓志铭》所载，李贽和逃到南安改姓的李允诚的派下有承继关系。这样，林广齐、林允诚的子孙就居住南安，改姓李，其他的仍旧居住泉州，还姓林；称为“林李同宗”。

李贽是居住泉州姓林的后代，可是他也改姓李了。《凤池林李宗谱》第十三页说，李贽“原姓林，入泮（进秀才）学册系林载贽。旋改姓李。避胜朝讳，去载字”。《晋江县志》卷八选举志记载嘉靖壬子科举人的名单中有“李载贽，后改名李贽”。可见，李贽原来的姓名是林载贽，大约在中举之前不久，改姓李，后来又因为名中的“载”字和明隆庆皇帝朱载

屋的“载”相同，犯了讳，又去掉“载”字。由此可见，李贽姓名的更改，是受到封建统治者压迫的结果。他家遭受大地主大官僚迫害致死者，李贽也非第一人。

二、世代务商的家庭情况

根据已经发现的几本《林李宗谱》的记载，李贽的家庭世代务商的情况就更加清楚了。

李贽始祖林间，在元末由河南光州固始县移居泉州“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海外诸国”（《光绪间宗谱抄录》残页）是经商海外贸易的巨商。

二世祖林鸞，“洪武九年奉舶西洋”。“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模厮（伊朗波斯湾）”（《凤池林李宗谱》），是一个兼营国内国际贸易的大商人。

三世林通衢，“下广为商”，“卒葬广东惠州府龙川县”。“公（林广齐）以资显”（《历年表》），都是大商人。

四世林易庵、五世林琛也都是商人。“易庵公卒长子琛引琉球入贡。……初公谳晓译语，蒙道府荐为通事官也”。

六世祖事迹不详。七世祖林白斋（即李贽生父），据《历年表》载“东井公……亦师白斋公”推断，可能是教书的。李贽的继父李钟秀是个穷秀才，而其叔李章田则“赁虎贸贾”（《李章田墓志》），也是商人。

根据《历年表》记载，在李贽活着的年代，许多族人也都是商人。他们有的“卖什货”，有的“卖米营活”，有的“开纸店又卖膏靛”，有的“贩鲜福州”，有的“载糖往苏”，有的“开棉行”，等等，不过经商的主要地点只在本地，规模大大不如前了。

在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末期，这样一个世代务商的家庭，对李贽的思想是很有影响的。

三、守城抗敌的爱国主义行动

李贽生长的故乡泉州，在当时是屡遭倭寇侵扰的沿海地区。据《泉州府志》记载，明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倭寇连年侵扰泉州，特别是嘉靖三十八年和三十九年（李贽正在泉州）尤为猖獗。“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复至郡城南星桥……排桥门至车桥，大焚民居，直至城下，时郡城分兵拒守，凡四阅月”。第二年正月又由浔美登岸，仍至车桥”。倭寇的侵扰一直延至隆庆万历年间，泉州一带“数年田亩遍为草莽，瘟疫盛行，死者枕藉”。

《清源林李宗谱》详细记述了李贽家族在倭寇侵扰泉州时遭受的破坏情景。嘉靖三十九年李贽因父亲林白斋死，从南京回到泉州。目睹国土家乡横受扰掠，他毅然“率子侄登城御守，虽矢石交加而无惧”。（《泉州李氏族谱》）“昼夜登陴击拆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加，米斗斛十千无余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卓吾论略》）这种反对侵略的爱国热忱是何等可贵！难怪李贽对于那些平日只知“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焚书·因记往事》）的腐儒，要视之为“豕矢”了。